「安全治理」的理論與實踐：以東南亞國協安全治理模式的建構與演化爲例

楊　昊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生

摘要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鮮少有學者結合「安全」（security）與「治理」（governance）兩個概念而進行經驗論證者。有鑑於此，本文試圖聯結上述兩個概念，在學理層次上發展「安全治理」（security governance）的理論建構；在經驗層次上，本文擬透過歷史變遷觀點，以當代東南亞區域內「安全治理」模式的建構與演化從事系統探討，並分析2003年10月第九屆東協高峰會「巴里第二宣言」（Bali Concord II）揭櫫之東協安全體內涵以及東協安全治理之前景。

本文以東南亞爲場域進行安全治理從概念邁向實踐的探討，並

本文初稿主要分為兩個部份，有關安全治理（security governance）在概念層次上的建構係發表於淡江大學所主辦之「2004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會」中；文中針對東協安全治理模式之建構、分析以及在理論層次的省思，則是發表於中正大學所主辦之「從比較觀點看國家治理的新模式」國際學術研討會，請參考：（楊昊 2004a；2004b）。謹在此感謝研討會評論人與《台灣政治學刊》之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電子信箱：alanhao@alumni.ccu.edu.tw。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頁 153-231，2005 年 12 月出版。

分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處理東南亞區域安全問題之相關國際制度的建構與發展。透過治理的觀點，將更能清晰呈現出東南亞安全情勢以及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發展系絡。在論證上主要分爲三個部份：首先，自理論層面進行治理概念的文獻探討，界定「安全治理」模式的內涵，並將此一安全治理概念應用到區域安全實務上；其次，在經驗層次上探討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變遷與發展；最後，回歸理論面，嘗試以「理論多元論」（theoretical pluralism）之觀點來勾勒出未來從事區域安全研究時所需面對的新分析架構，並就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在理論整合（theoretical synthesis）的未來展望以及實際政治的發展等方面進行評析。

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治理、安全治理、東南亞安全、國際制度、東南亞國家協會

壹、前言

一般而言，從事區域安全研究的學者所採取的研究途徑，不外乎從以歷史背景或國家特質爲基礎的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途徑、以各種辯論中之理論觀點爲基礎的國際關係理論途徑、以安全合作機制爲探討核心的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途徑、以制度研究爲基礎的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途徑、或者是從歷史或地緣戰略面向切入之地緣政治研究途徑等（Leifer 1990; Narine 1998a; Lim 1998; Tow 2001; Acharya 2002; 莫大華主編 2002）。無論研究者所選擇途徑爲何，爲了要從事系統化的區域安全分析，同時讓研究過程中所獲致之知識得以累積，吾人都必須正視一個在研究過程中極爲關鍵的核心問題，即理論在整體研究設計中的重要

性。事實上，理論研究在國際關係的學術領域中誠屬關鍵，一個好理論正如 J. D. Singer（1961, 78-79）所言之分析模型（analytical model）一般：在功能上不但要對現象進行正確敘述（description），同時亦要對現象間關係進行清楚解釋（explanation），並期望能進一步對現象本身的未來發展進行預測（prediction）。換言之，在更爲堅實的理論依據下，研究者得以在研究過程中獲致更多的發現。

長期以來，國際關係的研究大多以反應國與國之間（inter-state）的互動爲主，而此種研究途徑即反映在現實主義（realism）的理論主張中。舉例而言，Joseph M. Grieco（1993, 118-19）曾經歸納了主流現實主義之五點理論命題：第一、國家是國際社會中的主要行爲者（actor）；第二，國家對於成本（cost）的考量極爲敏感，將循理性來從事行動；第三，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是形塑國家的動機與行爲的主要力量；第四，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中將致力於權力與安全的追求，因而國家間常未能合作，甚至在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也未必能導致合作；第五，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對於國際合作之影響有限。[1] 在上述命題中，不難察覺現實主義學者所關注的焦點，大多聚焦於以利益與權力所驅使之國家行

[1] 上述五個命題，亦彰顯現實主義被稱為「理性主義研究途徑」（rationalistic approach）之特色。另外，針對在其中提及之國際制度，學界有不同的定義；其中，以Keohane（1989, 3-4）的定義較為學界所廣泛接受，他認為廣義的國際制度包含三種內涵：正式或非正式之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以及國際慣例（international convention）。就本文的名詞運用而言，國際制度意指廣義的制度、組織與建制之集合體；而國際建制所強調者，依循Krasner（1983）的定義，即在國際社會裡不存在能夠強力執行國際規範之中央政府的前提下，所建立的跨國合作機制或規範、原則、規則或者是決策過程，上述相關機制係依附在特定議題範圍中。

爲分析，因爲強調國家爲主要分析單元，從而使得國家以外的行爲者如國際制度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等僅能在「國際政治」之場域中發揮有限的作用力。[2]

然而，隨著當代國際體系中各國互賴（interdependence）程度的增加，以及國家間難以獨力解決之共同問題的產生，均使得現實主義有許多的基本主張以及核心假設，逐漸喪失其解釋與預測能力（Keohane 1986, 163）。譬如，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實踐與發展即被視爲是對現實主義之學理與實踐的重大衝擊。一般而言，目前所探討的全球化概念，意味著一種跨越疆界而延伸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活動，而這些活動將促使世界某個區域的事件、決策與活動極有可能對遙遠區域外之個人與社群產生重大的影響（沈宗瑞等譯 2001, 20）。就此而論，誠如Stephen D. Krasner（2001, 20）所言，國家作爲獨立自主的實體（autonomous entity）之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已被全球化之力量所侵蝕，這亦進而使得當代國際關係不論在實際政治上亦或學術研究上已經正式邁入所謂的「全球時代」。[3] 除了全球化外，因爲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或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興起而引發之跨國合作問題亦持有類似的邏輯。[4] 不過，無論是全球化還是區域化，近年來相關研究所涉

[2] 有關國際關係主流理論中之主要行為者的比較，請參見Rosenau 1982，其中的表一有詳盡說明與對照。

[3] Kenneth N. Waltz（1999, 694）曾經在一場演說中指出，全球化是 1990 年代的一股風潮，甚至是一股由美國所創造出的跨時代浪潮。

[4] 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快速崛起的中國近年來愈來愈重視其在東亞區域主義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大陸學界亦興起對於區域主義的研究風潮，近期相關著作可參見耿協峰 2003; 肖歡容 2003。

及面向，主要仍包含了超越國家層次之政治、科技、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的現象敘述與分析；相對而言，則較少涉及管理面（managerial）或操作面（operational）的理論探討與說明，而上述這兩個長期被忽略的層面即涉及到所謂的「治理」（governance）命題。

尤其是在安全（security）議題方面，如何維持穩定的秩序與安全無論對於全球、區域亦或是國家的發展而言，皆屬關鍵。然而，在安全的維持上，除了透過傳統國家層次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來追求某種均衡的狀態外，能否透過其他途徑的來維持秩序的穩定，從而使得「如何」藉由不同的觀點來瞭解安全維繫的其他面向，變得十分地重要。綜上，本文以東南亞爲場域進行區域安全概念之創新與邁向實踐的探討，並進一步分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處理東南亞區域安全問題之相關國際制度的建構與發展。在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發展過程中，區域性國際制度扮演著相當關鍵之角色。以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爲例，在 1967 年東協創立的初期，其追求的主要在於功能性的區域合作，而非是安全上的協力。不過，在數十年後的今日，東協卻儼然成爲東南亞區域安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穩定機制，甚至在 2003 年 10 月的「巴里第二宣言」（The Bali Concord II）中，東協國家領袖更進一步提出了東協安全體（ASEAN Security Community）的未來目標。要瞭解其中之轉折，本文嘗試先從理論層面進行探討。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鮮少有學者結合「安全」與「治理」兩個概念而進行經驗論證者。有鑑於此，試圖聯結上述兩個概

念，並在概念層次與理論基礎上探討「安全治理」（security governance）之觀點的建構，則顯得頗爲重要。針對此一強調制度功能的治理網絡（governance network），本文在經驗上擬透過歷史演進的觀點，針對東協安全治理的發展進行系絡回顧，並進一步探討東協安全體建構與演化之意涵。全文主要包括了三個部份：首先從理論面對治理概念進行回顧，並建立所謂「安全治理模式」的定義，藉以將此一安全治理之概念進一步應用到區域安全研究上；接續將嘗試從經驗上的歷史演進來探討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發展，藉以形塑理論與經驗的對話；最後，本文將回歸理論面，嘗試以「理論多元論」（theoretical pluralism）之觀點來勾勒未來從事區域安全研究時所需面對的新分析架構，並就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在理論整合（theoretical synthesis）的未來展望以及實際政治的發展等方面進行評述。

貳、治理與國際關係－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建構

一、國際關係中的治理觀－理論基礎的先探

近年來，學術界對於「治理」一詞的定義與用法各有所見，因此在晚近亦引起了不少辯論，特別是在治理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層次上（Pierre 2000, 3）。從字源上來看，治理一詞源自於希臘的“ *kybernetes* ”，在詞源學上與領航（navigation）與掌舵（helmsmanship）有關（Stokke 1997, 28）。不過，此一概念因爲 1990 年代的大量使用，相關文獻與定義不斷累積，使得治理的定義愈來愈模糊。是故，在不同的學科

領域或同一學科領域中的不同分析層次上，對於治理一詞的定義與運用多有所異。[5] 在政治學裡，從較爲宏觀的角度來看，「治理」一詞意味著統治過程中的所有制度層級與互動關係，進一步來說，治理係如何透過領控（control）經濟或社會系統，來達成集體目標之概念（謝宗學、劉坤億與陳衍宏譯 2002, 2）。以此種觀點的進行研究的學者，大多會持比較研究途徑探討區域、國家、國內制度或地方政府間在不同議題上展現之領控能力，其中又較常從政治、歷史、經濟或菁英等不同面向來進行治理分析。[6] 此外，亦有學者從社會-政治（social-political）或互動（interactive）的觀點來探討統治（governing）與治理的課題，主張前者是一種「互動的集合，其中包括了公部門與私部門在解決社會問題或增加社會機會上、參與制度上、以及建立規範性基礎上的共同參與」，而後者則是前者理論層次之基礎（Kooiman 2003, 4）。整體而言，近期以治理爲主的研究導向與研究途徑可謂汗牛充棟。

其實政治學界從事治理研究的時間並不算太長，雖然在 1980 年代公共政策學者始有著力，然論者所關切之議題仍僅鎖定在都市政策（urban policies）方面（Smouts 1999, 294）。在近期，政治學的次領域（公共行政暨政策）針對「治理」概念所從事探討者甚多，對於相關研究而言，治理意味著一種「政府與公民間的權力、影響與關係，藉此得以用來追求社會與經

[5] 譬如，在全球層次的治理，論者稱為「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此一概念在定義上與概念上亦顯多元，欲進一步了解，可參閱張亞中 2001，該文有詳細之比較與整理。

[6] 持類似途徑並以亞太地區作為研究個案者，可參見Maidment, Goldblatt, and Mitchell 1998。

濟方面等諸多計畫的執行」；換言之，公共行政或政策學者所強調的治理大致上是爲一種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概念（Bhatta and Gonzalez 1998, 3, 286-88）；無論是從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與政治經濟學的角度（Lynn, Heinrich, and Hill 2000），或是從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的觀點來探討治理的實質問題（Knoke 1990; Rhodes 1997），均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文獻。

在政治學的另一個次領域--國際關係中，有關治理之研究則出現在 1990 年代初期，而 James N. Rosenau 與 Ernst-Otto Czempiel 所著之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係爲此一系列前沿研究（frontier research）之濫觴，亦爲近期所興起之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Rosenau 與 Czempiel（1992, 4）認爲「治理」意味著某種安排（arrangement），並且係由共同之目標所促成的行爲，而這種行爲不一定是源自於法律上所明訂之責任，也不一定得依靠著像警察鎮暴時所使用的權力，來促成服從的行爲或者是弭平不服從的行爲。就核心意涵而言，「治理」其實等同於某種「對秩序、穩定以及政經管理的詮釋」（Makinda 2000, 163），而這種詮釋在全球層次、區域層次、或在跨國層次中皆可找到不少印證。整體而言，由 Rosenau 與 Czempiel 等學者所開創之全球治理研究的範圍愈趨廣博，不但涉及到全球化的管理問題，亦涉及了權力、權威與制度-國家間的相關辯證（Held and McGrew 2002）。

在國際政治中，由於並不存在所謂的中央權威，因而往往論及國際政治中的「治理」，我們常會聯想到國際制度與國際

建制等公共代理機制（public agencies）之角色與功能；透過不同議題範疇（issue-areas）中的國際制度與國際建制，國家得以建立某種有效解決集體問題之機制，進而提供了相對穩定之秩序（Nye 1991, 255; Thomas 2000, 15; Diehl 2001, 4-5）。此種秩序即爲論者常主張之「國際治理」或「全球治理」的堅實基礎。針對此，Makinda（2000, 163）特別強調在全球層次之治理的管理面，並指出它的特色就是「全球政治中的正式或非正式安排」（formal and informal sets of arrangements in global politics）。事實上，全球治理並不僅侷限於政治議題，因此我們可以透過一組較具通則性（generalized）之命題來定義----「全球議題中之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此種安排係源自於國家在全球時代中面臨到許多無法獨力解決的問題之困境，從而使得諸如國際建制、國際制度或非政府組織等行爲者，在解決問題以及管理全球事務方面逐日扮演關鍵角色。

在 1980 年代所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有關治理的文獻大致聚焦於如何管理相互依賴或如何管理「經濟全球化」的討論（Nye 1991, 253-59;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135-224; Starr 1997），因而使得國際制度的中介角色或主體性更加受到重視。譬如 Nye（1991, 255-56）即曾指出，國際制度的出現不但能有助於分攤政府間的責任，更能提供政府有效資訊，從而有利於外交工作之進展。甚者，在從事國際經濟研究的相關文獻中，以制度或特殊機制結合公部門與私部門來提供所謂的「善治」（good governance）（O’Brien et al. 2002），透過某種機制來界定公共利益的構成以及監督公共利益的執行，更是治理概念的極致發揮。

此外，在區域研究中亦有學者嘗試將「治理」運用在比較研究與個案探討上。在相關分析上所涉及到治理概念，主要有兩種意涵：**（1）在國家層次上**，論者大多循比較研究途徑，探討不同國家在區域議題上的管理模式，並嘗試找出一套較符合區域特性之基本共同治理模式；**（2）在區域層次上**，研究的焦點將可能換置到超國家機制上，以超越傳統民族國家層級的問題管理與解決途徑作爲探討主題。[7] 一般以治理途徑來處理區域議題之文獻，大多針對歐洲區域整合過程或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 EU）來進行對照。譬如，循著政策導向的研究途徑則會強調網絡的重要性，此網絡強調的是一種共同治理（co-governance）組合的形式，其中不同利益的匯集正構築了公部門與私部門相對開放的互動形式（Kooiman 2003, 106）。該途徑在實際例子上與歐洲地區現正興盛之多層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的制度研究有關（Jachtenfuchs 2001, 253-55; Sedelmeir 2001, 173-82; Krahmann 2003, 327-29; 黃偉峰 2003; 藍玉春 2005）。此外，因爲治理概念穿越了國內與國際、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以及公領域與私領域間的界線，而多層治理又嘗試將中央化（centralization，特別是歐盟本身）與區域化的過程同時壓縮在一個整合過程中，是故將涉及更爲複雜之政治行爲者在此網絡中互動的問題。就此，晚近亦有學者以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觀點來探討此類歐洲多層治理

[7] 誠如Krahmann（2003, 323）所言，治理概念依著不同的分析層次（level-of-analysis）而異，然其共通點係為治理過程中核心政治權威位置之改變。Krahmann一文所要揭櫫的重點，即當代治理研究所關心者係為國家、區域與全球層次之治理模式的特殊型態解釋，而非是跨越各個層次之治理安排的比較與聯繫。事實上，此概念實應為從事治理研究者在日後從事相關研究時有待精鍊與補強之處。

下的複雜主權問題（Aalberts 2004）。

綜上，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來重新梳理國際關係中的治理命題：**（1）就縱向的概念層面而言：**治理概念係涉及全球、國際、區域、國家以及地方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分析層次。無論對何種分析層次而言，治理誠如Oran Young所言，意指針對集體問題所從事解決的途徑（Stokke 1997, 28）；**（2）就橫向的過程（process）層面而言：**針對集體問題所從事解決的途徑同時涉及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制度等種面向與議題範疇；就此，以Krahmann（2003, 331）的詞彙來詮釋，治理其實既是致使政府與非政府行爲者透過無中央權威體制下之政策制訂與執行，來協調彼此間的互賴需求與利益的結構，同時也是上述協調的過程。而初步整理這些來自於不同次領域中所針對治理概念在縱向與橫向研究上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因爲缺少了中央政治權威，則「制度」（無論國內還是國際制度）在治理過程中更將代表著一個關鍵的匯集點。甚至有的學者更直接指出，存在於國際關係中的「建制」其實就是一種「治理的系統」（Stokke 1997, 26-73; Kooiman 2003, 108）。[8] 要之，本文嘗試對治理作以下的定義----**本質上，治理意味著一種會不斷演化的體系或機制，它同時是結構也是過程，其目的在於透過行爲者間的協調來提供秩序。在治理體系或過程中，『制度』將作爲秩序提供的網絡中心，而該網絡將涉及諸多行爲者，其中包括了國家、非政府組織、國際建制及其他制度。實踐上，共治的行爲者在治理結構與過程中將透過制度來處理集體問題。**[9]

[8] 進一步來說，國際建制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的一種「共同治理」機制。

[9] 誠如Haas（1990, 18）所言，國際組織（制度的一種）即可被視為「問題

在實際運作上，治理概念有無實踐或具體的範例？在國際實際政治中，1995 年聯合國成立滿 50 週年後，針對全球治理的實質活動與討論日趨頻繁，「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成立對於國家或非政府組織闡揚全球治理的理念，更是不遺餘力（林碧炤 2001, 164）。另外，在區域方面的治理實踐，歐盟不斷演化的整合過程（ongoing integration）正是一個重要的例證。此外，在特定議題上，特別是國際貿易的規範方面，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亦扮演了建立貿易秩序之規則與原則的治理角色。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學術界正因世界政治中的各種實踐，從而對於全球治理之研究有了更多的關注。[10] 事實上，各種層次的「治理」研究，亦在研究方法上爲政治學研究注入不少「指示性」（prescriptive）的研究動能。

二、治理與安全：演化的安全觀所賦予的治理契機

「安全研究」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之一，長久以來，學術界針對「安全研究」一直有諸多在理論與實踐上的爭辯與討論（Nye and Lynn-Jones 1988, 6; Buzan 1991a, 3-12）。在概念上，「安全」是一個相對之現象（relational phenomenon），[11] 相對於「失序」而言，它象徵著國際關係中存有的某種穩

之解決者」（problem solver）。

[10] 學術界對全球治理的討論時間並不長，在 2000 年之後有關全球治理研究之著作，可參見Nye and Donahue 2000; Diehl 2001；其中，Diehl所編之合輯主要從國際關係的角度探討全球治理的幾個重要面向，同時也包括了美國與聯合國的互動關係；另外，在經濟議題上之全球治理的相關文獻，亦可參閱 O’Brien et al. 2002。

[11]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制度與國際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旨在締

定或秩序，即在安全的狀態裡，戰爭或衝突的發生都將可能受到約制。針對安全研究，特別是在早期由現實主義學派所壟斷的國家安全系絡中，軍事力量的追求一直是國家安全在理論面與政策面的核心要素。[12] 當然在現實主義陣營裡，不同學派的現實主義者亦會存有不同的主張，譬如：對於攻勢現實主義者（offensive realist）而言，追求更大的相對權力，甚至是霸權地位的追求才是其所欲達成的目標；對於守勢現實主義者（defensive realist）而言，則是持較爲保留的態度，他們大多僅專注於透過目前之權力平衡來維持己身之安全（Mearsheimer 2001, 22）。儘管上述二者在權力觀點上有所歧異，但他們均服膺「軍事安全其實就等於是狹義的國家安全」，更堅信「追求更爲健全的軍事安全亦即等同於追求更爲完善之國家安全」之教條。循此邏輯，在安全議題中是否能談到「治理」，就現實主義學派的觀念而言，定有不少爭議。

不過，在後冷戰時期，現實主義的觀點逐漸受到挑戰，特別是在理論的解釋力與預測力方面。晚近隨著全球相互依賴程度的提高以及全球化效應的發酵，傳統的安全觀開始不斷演化，從而使得治理研究在安全議題上有了得以發展的契機。此一契機主要與安全研究在**縱向（分析層次）**與**橫向（議題範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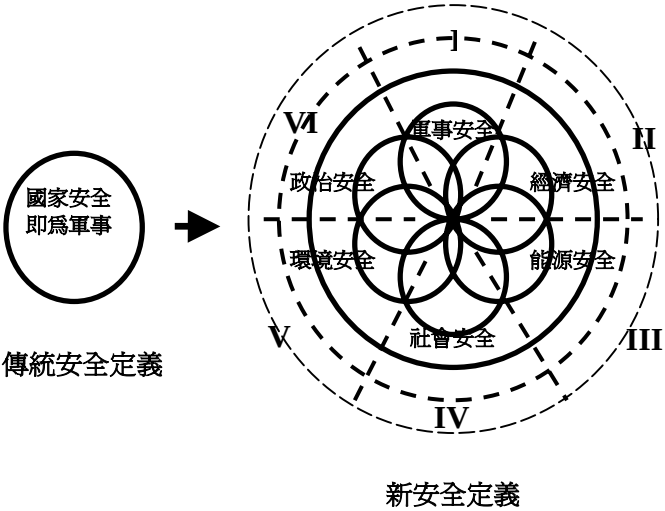
造一個自由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此種秩序透過國際制度所鋪陳的複合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網絡，不但能提供成員國透明之資訊，亦能或多或少地約制各參與國之對外政策，因而使得國家間的互動更為安全也更有保障。相關論述請參見Klare and Thomas 1991（266-69）。

[12] 譬如：Walter S. Jones在研究國際安全上即側重軍事注，強調強權間的軍事競合將對國際安全有深遠之影響，參見Jones 1996 （217-40）。事實上，現實主義學派在安全研究上所強調之分析單元是以國家為主，而確保國家免於他國攻擊而生存或被推翻則為其傳統信念，參見Stares 2000（151）。

發展上的共同演化有關（參見圖一）。最明顯的是，如果我們從全球一體化（globe as a whole）的角度來看，誠如全球治理委員會在 1995 年的報告書中所言，現今所關注的全球安全應該要跳脫傳統的國家安全關注侷限，更應拓展到對於人類與地球的關懷上（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78）。而自二戰結束後所出現的不同安全觀，不但象徵著安全研究的「縱向演化」，亦再次呼應了目前研究所關懷的對象或強調的分析單元已非僅有國家，而其他的非國家行爲者，諸如個人、國內社群、國際制度甚至是非政府組織等，都可能成爲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變數（Buzan 1991）。

除了縱向演化外，安全研究在研究範圍上的「橫向演化」契機，亦充實了安全維繫所需囊括的主要範疇（參見圖一）。譬如，Paul Stares（2000, 154-55）即強調新世紀將面臨新的安全挑戰，其中包括種族與族裔衝突、經濟動盪、生態環境上的破壞、甚至是流行病等等。此外，諸如 Sean M. Lynn-Jones 與 Steven E. Miller（1995）所編之 *Global Dangers: Changing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一書中，亦針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安全收錄了許多與傳統安全研究面向不同之文獻，其中包括了環境議題、移民問題以及民族主義等可能之安全挑戰。而 Ronnie D. Lipschutz（1995）主編之 *On Security*，以及 Terry

圖一：逐漸擴大之安全定義與安全研究所囊括範圍之示意圖



說明：

在新的安全定義中，安全所囊括的內容確實有擴大之勢，在涵蓋範圍上亦由國內層次拓展到國際/區域（如粗虛線所示）或全球層次（如細虛線所示）的安全關注。舉例而言，在新安全定義的內涵上可能將包括下列幾種問題：

I. 區域層次的衝突預防問題與全球層次核武擴散問題；
II. 區域層次的恐怖主義、洗錢等跨國犯罪問題與全球層次的經濟危機問題；
III. 區域層次的能源共同開發暨合作問題與全球層次的能源危機問題；
IV. 區域層次的族裔政治所引起的社會問題與全球層次貧窮問題；
V. 區域層次的霾害所引起的環保問題與全球層次衛生管理問題；
VI. 區域與全球層次的恐怖主義威脅與政治衝突問題。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Terriff、Stuart Croft、Lucy James 以及 Patrick M. Morgan（2001）等編著之 *Security Studies Today* 等專書亦爲 1990 年代針對安全研究之演化所進行之討論的重要著作，同時亦收錄了不少從國際關係理論角度出發的文章來審視當代安全研究的發展。整體而論，上述二十一世紀的安全關注將可大致解構爲五個部分（sectors）：政治、軍事、經濟、社會以及環境安全，這五種安全的關注在晚近重新建構出冷戰後的新全球安全形式（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Buzan 1991b, 432）。此種安全研究範疇之進一步細分，基本上意味著安全研究朝著在議題上更爲廣博之演化方向發展，同時也賦予了得以與治理進行聯結的契機。

針對上述「縱向」與「橫向」的共同演化過程，本文認爲我們可以透過對不同安全觀之發展的瞭解來獲得些許啓示。在安全研究的演化過程中，除了早期的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外，[13] 本文認爲更爲多元的安全觀，如「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又有學者稱之爲「相互安全」（mutual security）、[14] 「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等概念隨著時間演進的發展，正

[13] 在此主要強調的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傳統集體安全實踐。此一傳統型式的集體安全強調國家間的同盟關係，建立聯合軍事力量，透過集體效應（all for all, all against one）來共同協助受威脅的國家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並進一步維繫同盟之軍事安全。該傳統集體安全旨在追求國家生存與不被侵犯，從而使得國家更重視軍事安全觀以及有效的武力解決辦法，而非朝向晚近的「治理」目標發展。

[14] 共同安全與相互安全的概念在 1980 年代常被交互使用，不過亦有學者對相互安全有不同的詮釋，譬如Richard Smoke與Viktor Kremenyuk即將相互安全視為是在發生衝突中的雙方（可以是一組國家或同盟）所需維繫的安全概念，主張雙方可採取某些減緩衝突、確保安全的行動，參見Capie and Evans 2002（171）。

式使得治理概念在安全議題上的運用與聯結則有了新的風貌（相關比較，請參見表一）。以最早的「共同安全」爲例，此一概念始出現是冷戰時期的 1980 年代，主要實踐場域爲西歐。此一新安全觀立論於國際機制或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發揮約束各成員國行爲以穩定國際情勢的效用（Snyder 1999, 102-19; Väyrynen 1999, 55-57; 林碧炤 2001, 167-168），透過一系列降低戰爭風險、限武、並朝向裁減軍備發展的長期安全努力，促使國家面臨利益衝突時，願意以合作來取代對抗（Palmer 1982, 11; Baylis 1997, 200; Capie and Evans 2002, 59）。就「共同安全」的發展而言，治理其實意味著**「由國際建制支持的一個制約衝突與推動合作的系統」**。換言之，共同安全強調的是一種建立國家間互信系統的概念，在方法上則是透過制度來倡導國家間互信之原則與規範的建立。

上述「共同安全」在內涵上缺乏清晰的定義，而「合作安全」其實亦然。不過，合作安全卻發展爲學界所廣泛接受的安全合作型態。就操作面而論，「合作安全」包含三個重要面向：**（1）議題包容性：**強調安全合作所包括的參與者與議題範圍；**（2）對話的習慣：**強調建立有效且暢通的成員間對話管道；以及**（3）合作的實踐：**強調當代安全問題已不再是一國可獨力承擔或面對，而行爲者（國家與國內行爲者）將透過更爲具體的合作，共同克服安全問題（Stares 1998, 178; Capie and Evans 2002, 99-100）。整體而言，「合作安全」強調透過將軍事安全與非軍事安全相互結合的漸進過程，國家得循合作、對話的途徑來維持國際安全。澳洲前外長 Gareth Evans 更進一步指

出合作安全的幾個重要構成要素：諮商性（consultation）、相互性（mutuality）、可靠性（reliability）、透明性（transparency）以及預防性（prevention），強調安全政策要持續長存則有賴於社會利益團體、國家、以及區域組織必須間的進一步合作（Evans 1994; Alagappa 1998, 635-38; Väyrynen 1999, 57-59; 林碧炤 2001, 167-168）。對「合作安全」而言，治理即意味著**「成員體間合作形式的確立與合作機制的創建」**。就此，「合作安全」較「共同安全」在實踐上來的清晰許多，儘管其目標均在追求國家間的互信，特別是在如何維繫安全的過程中，制度成爲了互信建立與衝突管理的重要工具，從而使得治理的概念將透過「合作安全」的機制建立而有較爲具體的實踐。

如果說由共同安全至合作安全的發展是光譜延續之過程，則「綜合性安全」概念的出現可謂是當代安全觀演化上的重要突破與轉折。論者對此安全觀的發展有兩種不同觀點，其一強調技術層面的合作，包含了信心建立、透明度、逐漸裁武（gradual disarmament）、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等（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80; Acharya 1999a, 8-9）。這個部份的主張與「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的邏輯頗爲類似；然而，比較特別的發展則在於第二個觀點，亦即源自於 1970 年代的日本、而在冷戰期間由東南亞國家大力鼓吹的「綜合性安全」的概念。[15] 在實踐上，特別是以東協國家爲例，其嘗試將安全所囊括的範圍擴及其他非傳統軍事安全的面向上以突顯安全的「多元複合性」，並且融入合作安全的邏輯，

[15] 有關日本與東協的綜合安全概念形成與實踐之探討，請參見Akaha 1991; Chan 1992; Acharya 2002; Ferguson 2004; 陳欣之 2000。

透過東協的「制度平台」來加強非傳統安全上的互動與合作，從而使得區域得以維持穩定（Ball 1996, 177-78; Alagappa 1998, 624-29; Snyder 1999, 102-19; Capie and Evans 2002, 64-75; 劉復國 1999, 29-31; 陳欣之 2000）。在分析上，我們得以發現這些多元的安全面向以及更爲多元的研究觀點，不但豐富了安全研究的範圍，同時亦透過軍事安全擴溢到變數（variables）更多且更爲複雜的綜合安全之變動過程，從而對對傳統現實主義之安全主張投諸了不少的挑戰。就「綜合安全」而言，治理的意涵指的是**「結合制度功能與多元議題的綜合安全機制」**，亦即綜合安全旨在建立更爲廣博的安全合作基礎；鑑於此，在各個安全議題中的「治理」將成爲其主要目的，而相關制度（如綜合性的區域國際組織）的建立將是追求此一目的的重要工具。

與上述安全觀相關但又另闢蹊徑的，是嘗試顛覆現實主義安全觀的「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該概念是聯合國 1994 年《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中所大力推動的理想，強調「以人本價值爲核心，促成人類社會免於長期威脅或突然的傷害」（Tehranian 1999）。有鑒於全球化時代，舉凡跨國移工移民、跨國經濟與網路犯罪、恐怖主義活動、生態與環境威脅、疾病感染問題、[16] 對人權之壓迫等多元多變之新型安全威脅，將對人類之安全有更直接且更深遠之影響。[17] 簡

[16] 舉例而言，於 2003 年春季竄起之非典型肺炎（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即是對人類安全的一個重要威脅，國際上或國家間對於此一威脅均有不同的反應措施。舉例而言，中國即就此威脅在與東協國家的會議中提出一個安全倡議（security initiative），並舉行安全政策會議（security policy conference），請參見Breckon 2003。

[17] 有關傳統安全觀較少論及之個人與社會面向，亦可參見Biligin 2003。

單來說，人類安全是爲一種在本質上超越國家中心主義（statism）之安全觀。[18] 秉乎此，聯合國的全球治理委員會在

表一：安全與治理的關係：近代安全觀的比較與治理之意涵

	集體安全	共同安全	合作安全
發展時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	冷戰時期的歐洲	1980 年代後期的亞太地區
內涵	建立同盟關係，建立聯合軍事力量，透過集體效應（all against one）來共同協助受威脅的國家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並進一步維繫同盟之軍事安全	透過國際機制之建立與各國之自我約束來穩定國際情勢	透過將軍事安全與非軍事安全相互結合的漸進過程，國家得以透過合作、對話來維持國際安全
目標	追求國家生存與不被侵犯	追求國家間的互信是主要目標	建立國家間的互信與衝突管理
方法與特色	以國家爲主的軍事安全觀，重武力解決方法	以國家爲主的軍事安全觀，並佐以制度作爲追求互信的方法	以國家爲主，其他行爲者爲輔的軍事安全觀，制度成爲了互信建立與進一步合作的重要基礎
分析層次	國際—國家	國際—國家	國際—國家—國內
治理之意涵	集體安全僅能維繫軍事安全，治理並非其目的。單單透過集體安全，並無法追求更爲理想的善治目標	國際建制支持的一個制約衝突與推動合作的系統	成員體間合作形式的確立與合作機制的創建
亞太地區的實踐	早期的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	加拿大與澳洲的對外安全政策	澳洲的安全觀

[18] 事實上，國家中心主義最為重要的核心概念即主權所具有的對內最高性與對外排他性。國家維繫安全上與主權之不可侵犯息息相關。儘管如此，晚近學者對主權內涵始有不同詮釋，致使主權與安全間之關係不再如此絕對（absolute），亦不再如此難以撼動，請參閱Makinda 2001（401-19）。

表一（續）

	綜合安全	人類安全
發展時間	1970 年代的日本與冷戰時期的東南亞各國	後冷戰時期
內涵	嘗試將安全所囊括的範圍擴及其他非傳統軍事安全的面向上，並且透過這些面向的加強互動與合作，區域安全得以維持穩定	與「人」相關的議題，舉凡移民問題、跨國之經濟與新式網路犯罪、恐怖主義活動、生態與環境威脅、疾病感染問題、對人權之壓迫等多元、多變之新型安全威脅，將對人類之安全有更直接且更為深遠之影響
目標	建立更為廣博之安全合作基礎	追求善治是其目標
方法與特色	多元行為者（但國家仍是主要角色）與多元議題的廣義安全觀，因而治理成為了主要目的，而在其過程中制度扮演了相當關鍵角色	多元行為者與多元議題的廣義安全觀，透過制度所進行的治理是主要方法
分析層次	國際（強調區域）—國家—國內	國際（強調全球）—國家—國內（強調個人）
治理之意涵	結合制度功能與多元議題範疇的綜合安全機制	以人本價值為核心，確立人類議題範疇以及建立管理人類事務體制的功能網絡
亞太地區的實踐	如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南亞區域論壇（ARF）、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	聯合國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議程設定以及加拿大近年所鼓吹之的新外交（New Diplomacy）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995 年的報告中不但再次強調「人民的安全與國家的安全都是同等重要」，隨後在 1999 年聯合國官員 Vladimir Petrovsky 針對 1999 年的《人類發展報告書》中，又進一步重申「人類安全是對於人權與環境的最優先保護」（Abad 1999; 楊昊 2003）。到了近期，聯合國亦大力行銷秘書長 Kofi Annan 對於如何完成人類安全之目標的重要談話，強調「要有建立一套在聯合國、政府與非政府行為者間之動態、創新的伙伴關係，才能達成人類安全的目標」（UN 2003）。就「人類安全」而言，治理的意涵則是指**『以人本價值為核心，確立人類議題範疇以及建立管理人類事務體制的功能網絡』**。換言之，在嶄新的人類安全中，治理的結構將朝向更全面且更細緻的方向發展，而追求善治將是此新安全觀之目標。在追求善治的過程中，相關制度或機制的建立亦會朝向更為務實且更具效能的方向演進。

當然西方安全概念的演化並不僅止於上述幾個重要發展，因考量篇幅與邏輯相關性，本文僅在此臚列在安全研究演進過程中較為關鍵的里程碑，以作為陳述安全概念及實踐方式與治理間之關聯性的發展脈絡。[19] 不過，其實從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到綜合安全，以及近期跨越不同分析層次的新型人類安全觀，此種愈來愈強調「所有的人類，與國家一樣，都有權利

[19] 除了西方世界的發展外，中國在後冷戰時期亦提出自己的新安全論述，亦即「新安全途徑」（new security approach）。中國官方所提之新安全途徑係立基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與綜合安全的基礎上，並進而反映亞太地區的政治現實與安全環境（Capie and Evans 2002, 175-78）。在議題範疇的認定方面，新安全途徑不但認知到軍事安全外的「非傳統安全」之重要性（陸忠偉 2003），亦認知到全球化對於國際安全的衝擊，以及中國面對新的安全環境與結構下所應採取的立場與態度（王逸舟 1999）。而中國循新安全途徑的實際發展，亦相當程度地透過中國和平崛起（peaceful ascendancy）的論述，沖淡國際間對於中國威脅論的警惕與不安。整體而言，中國的新安全途徑之提出，雖然延續著安全觀演化的邏輯，不過在實踐上僅為中國所適用。

來確保自己的生存，而所有的國家皆有義務來保護這些權利」（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84）的演變歷程，正象徵著後冷戰時期全球時代中嶄新的安全原則。透過此一演化的脈絡，我們得以瞭解，**安全與治理兩個概念並非相互排斥（exclusive），並且在安全觀的演化過程中，將有更多得以發揮治理之功能的空間與機會**。對本文而言，安全議題的治理課題（即所謂的「安全治理」），並非是傳統霸權行爲的絕對宰制或軍事力量的強勢展現所形塑的不對稱關係，[20] 而是將探討的重點聚焦「治理網絡」的核心，特別是國際制度或所謂依議題領域所設定之國際建制的角色上。在分析上，將此核心立論應用在區域研究（特別是區域安全的研究）中，即形塑了本文所欲探討之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重要基礎。

三、國際制度作爲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核心－整合性分析架構的建立

隨著全球事務的日趨複雜和國家間的互動頻繁，加以資訊科技發達、人員、資金的流通不再受到傳統國家疆界的限制，國與國間之互賴程度更顯密切；對於傳統民族國家而言，單以一國之力確實很難再處理各種跨國界之高度複雜議題。即使是強權國家（great power）或者是霸權國家欲獨力遂行其意志來影響國際政治之發展，亦將面臨相當嚴峻之挑戰。

從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倍受外部影響與經濟規模高度影響的互賴世界中，國際制度的出現在理論上應該是一個必

[20] 關於此點，可參閱Art and Cronin 2003，Robert J. Art在該書結論處強調所謂的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在運作上實為困難，同時實踐成功率亦不高。

然產物（Frey 1997, 106）。特別在後冷戰時期，透過國家間的合作來解決共同問題或化解衝突的現象變得特別明顯，而此種在主權國家的同意下組成的國際組織或國際建制的大量出現便是因應此種需求的反應（Martin and Simmons 2001, 444-46）。鑑於此，本節嘗試針對（1）制度與治理的關係；（2）安全治理的理論基礎；（3）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建立等三個命題，進行相關分析。

（一）制度與治理的關係：制度作爲治理之核心

從事制度研究的學者大多採經濟學原理來探討制度的起源、維持與演變。循著經濟學的邏輯，確實不難發現，在全球互賴關係的強度與廣度提高，以及對規範、資訊及交易成本上有更進一步需求的前提下，國家對於國際制度在數量上及功能上的需求亦當相對增加（Keohane 1989, 101-31）。不過，這仍未清楚回答制度與治理間的關係實指爲何？國際政治學者Harvey Starr（1997, 2）曾主張將國際制度中之「建制」與「治理」相互聯結，並稱建制爲「在某一國際互動領域中，透過規範、規則、法律以及組織之『治理』」。承襲Starr的觀點，從建制到制度，這些機制之所以可以作爲全球或區域治理中的重要核心，重點在於它們除了提供「在某些議題上」之治理有效性（effectiveness）外，[21] 其實最關鍵的還是提供了在無政府狀態中進行治理的正當合法性（legitimacy）。[22]

---

[21] 在此，「有效性」之意涵即在提供「有效的多邊主義」（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參見Debiel 2000（25-41）。

[22] 「正當性」與「合法性」其實是一體兩面的概念；正當性係一個較為模糊與較為廣義的概念，但一般而言較強調在法理上所具有之合法性。譬如，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是聯合國的一般原則（general principle），但聯合國安理會

首先，在有效性方面，在某些議題範疇中國際制度之所以能夠進行有效治理，其關鍵係在於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之精神的實踐。從全球層次來看，多邊合作正是 1990 年代「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的基本特質(Wurfel 1996, 279)，而多邊主義即象徵著在此秩序中所強調之「治理」的約束力與強制性，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多邊主義之終極目標將得以與全球治理相互結合（Smouts 1999, 294）。[23] 是故，立基在多邊主義之精神上，制度得以透過集體的力量對國家進行約制，對區域發展的穩定而言，將有助於朝區域治理的願景發展。再者，在正當性方面，國家間爲了解決某些共同問題或者爲了維護共有利益（common interest），會透過讓渡某些權力予國際制度來解決問題。換言之，而在此治理途徑中，國家與國際制度間將爲授權（delegation）型態之互動關係，亦藉以建立起國際制度的正當性，而此一正當性將使制度在全球治理中之治理行爲更加嚴謹且更有法理上之依據。[24]

（UN Security Council）可以依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判定某一問題是否「對國際和平或安全造成威脅」，而不適用該不干涉原則，從而進行對某國之干預。相關論點請參見Oudraat 2000（52）；另外，從聯合國憲章探討安理會行動合法性的文獻，參閱Sato 2001（309-52）。

[23] 在早期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多邊主義的定義以Robert O. Keohane的「在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國家群體中之國家政策協調之實踐」較為常見，可參見Keohane 1990（731）。近十多年來，則以 1992 年John Ruggie所提出之多邊主義之特色最為常見，有關多邊主義之內涵，主要包含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非歧視性或普遍性行為原則（nondiscrimination or 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以及擴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等三個特色，可參見Ruggie 1993。

[24] 學界針對國家與國際組織或制度間之授權關係之探討，多見於 1990 年代中、末期在《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期刊中之相關論著，並在 2001 年由Lisa L. Martin and Beth A. Simmons彙編成*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一書，相關內容可參見Martin and Simmons 2001。

在探討制度治理途徑的理論基礎的同時，我們可以發現有關制度之理論研究，誠如Kratochwil與Ruggie（1986, 362）所言，從 1940 至 1950 年代至今皆有不斷進步（progressive）之勢。[25] 特別是在 1980 年代以後，更成就了制度主義研究綱領的發展。1980 年代Krasner（1983）等學者以國際建制爲主題的辯論，透過不同學派間之對話，不同觀點之激盪爲制度與建制之研究奠定了極爲重要的理論基礎；到 1980 年代末期與 1990 年代初期由Keohane所提出之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26] 及其所強調的制度功能理論（functional theory），則爲制度在治理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提供分析與指導實際政治之說明（Keohane 1989; 鄭端耀 1997）；到了 1990 年代初期，作爲增加制度有效強制力與約束力之多邊主義學說，爲制度在治理過程中之強制約束（coercion）提出了理論基礎與實證回應（Ruggie ed. 1993）；在 2000 年後，學術界針對國際法制化（international legalization）所從事之研究，更是嘗試透過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途徑將制度研究與國際法相互結合，以不同的學科視野分析「制度如何進行治理」（how institutions govern）。[27] 到了 2002 年，制度研究與治理研究的結合亦在Keohane所重新彙編的*Power and Governance*

[25] 此一不斷進步的趨勢豐富了 1980 年代國際建制的研究綱領。Richard K. Ashley曾針對Friedrich Kratochwil與John G. Ruggie的研究進行評析，並指出他們所嘗試找尋國際組織在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上的核心（hard core）其實就是「無政府狀態下的治理」，此一觀點再次強調了國際制度所扮演之關鍵的治理角色。請參見Ashley 1989（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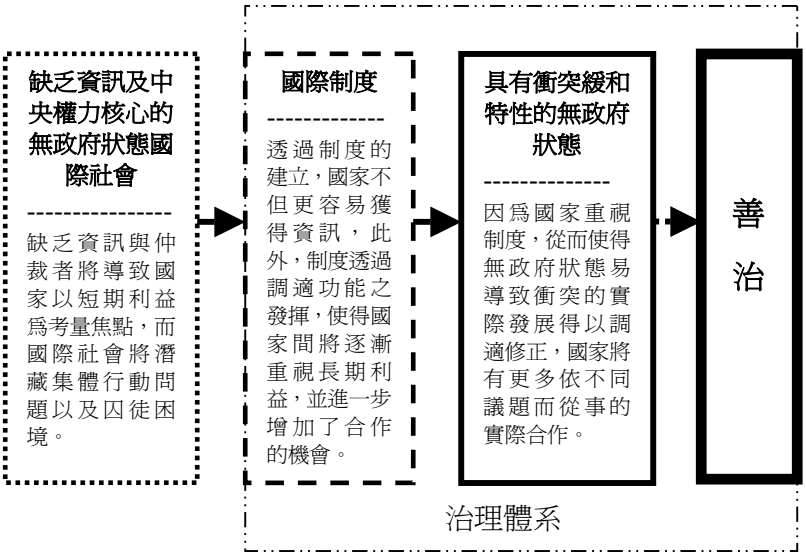
[26] 在 1989 年的經典著作中（特別在未曾出版過的第一章裡），Keohane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名稱來正式定位自己的研究脈絡，請參見Keohane 1989（vii, ix, 2）。

[27] 可參見Goldstein et al. 2001，該特輯對於國際法制化有相當精采的討論。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一書中，透過重新整理新自由制度主義提出後十餘年的理論發展，有了更清楚的說明（Keohane 2002）。這幾個階段中，相關學術文獻的累積對於制度與治理間的關係有了愈來愈清楚的說明，而就此我們也不難發現，制度其實就是治理過程的重要核心。

事實上，制度之所以在治理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原因正如同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的基本主張，在理論上將國際制度視爲一個重要且有助於國際合作的力量，透過制度功能之發揮將有助於合作目標之達成。論者大多主張，國際制度提供了透明化的資訊，可以降低存在於國際社會中的不確定性，並提高國際合作的可能。制度的建立會加強國家的合作態度，並會進一步透過內規改變國家對國際關係的處理模式等（Keohane and Martin 1998）。特別是在「資訊」的關注上，晚近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更是強調「資訊」之所以會扮演著極爲重要的角色，關鍵有賴於制度功能的發揮。也就是說，在主張缺乏資訊與仲裁者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中，將可能導致國家以短期利益爲考量焦點，從而使得國際社會將潛藏集體行動問題以及囚徒困境，並容易發生衝突而潛在危機。不過，透過國際制度或國際建制的建立，作爲重要行爲者的國家，不但在資訊取得上更加容易，並且進一步透過制度調適功能之發揮，使得國家間將逐漸重視長期利益，並進一步增加了合作的機會。正因爲國家重視國際制度，從而使得原本易導致衝突的無政府狀態得以調適修正，而國家間將有更多依不同議題所從事的實際合作，並得以進一步追求在各個議題中的善治（請參見圖二）。

圖二：制度主義發展邏輯示意圖：無政府狀態、制度、國家與治理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 Hobson 2000, 97。

（二）安全治理的理論基礎－建構多元理論的對話空間

雖然制度係作爲治理過程的中心，不過，針對國際制度本體的討論確實亦爭議不斷。到底國際制度有其自主性（autonomy），抑或僅爲國家爲追求本身利益之工具（instrument），諸如此類的主張均在學界引起長期的討論（Martin and Simmons 1998）。譬如，Friedrich Kratochwil與John Gerard Ruggie在 1980 年代即強調國際組織研究之重要性及其長期變遷，並從正式制度、制度過程、組織角色以及國際建制

等四個研究階段的文獻中探討所謂的國際治理，並進一步指出國際制度應有其主體性存在（Kratochwil and Ruggie 1986, 753-75）。當然，亦有學者認爲我們不應該對國際組織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過於樂觀，因爲組織或系統仍可能因爲失靈機而使得制度在穩定秩序的同時亦存失序之可能（Gallarotti 1991, 193-220）。儘管如此，比較難否認的是，站在治理的角度，國際制度（尤其是聯合國或某些區域性的國際組織）在某些議題或特定的情況下確實能代表其成員國。[28]

對國家而言，國際制度或國際建制是透過原則、規範、條約、國際法等機制所建立起來的正當性主體；換言之，國際制度在從事治理的學術研究或相關分析上將具有兩個層次之意涵：

1. **就其「功能」層次而言**，國際制度是單元進行互動與學習的場域或平台，[29] 於此一平台上，作爲單元的國家得以透過互動來進行合作。就此，國際制度成了治理研究的自變數

[28] 「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為國家所組成之社群（community），若其組成份子若能接受國際組織或制度之角色，即意味著此一組織或制度將具有代表國家之合法性與正當性。但在全球治理中，因為行為者的多元化，而傳統國際社會將成為「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中之一部分，故國際組織或制度的正當性就不僅止以國家為基礎而更加複雜。但可否認的是，在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等議題上，以及在某些一致性的對外關係或干預行動上，國際組織仍能代表國家間之集體立場。相關論點請參閱Junne 2001（192-93）; Abbott and Snidal 2001（32-39）。

[29] 有關制度功能面之探討，可參閱Keohane and Martin 1998（387）; Haggard and Simmons 1987（510）; Mitchell 1998（109, 125），Mitchell主要探討國際制度所具之將資訊透明化的功能；另外亦可參見Lake 2001（156），Lake在文中主要探討制度作為解決國家間合作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之方式；此外，有關「互惠」概念之的探討，可參見Krasner 1983; Keohane 1989（132-57），於此，Keohane乃透過偶發性（contingency）與等量性（equivalence）等兩個面向來解釋互惠的概念。

（independent variable），或者是中介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也就是說，制度成爲了治理是否能實踐的影響成因。循著此一途徑進行研究的學者頗多，如Robert O. Keohane、James N. Rosenau等；

2. **就制度之「本體」而言**，制度具有國家所讓渡之部分主權或自主權所構成的代表性，[30] 在理論上此一據有正當性之權威將從對國家造成實質（*de facto*）或法理（*de jure*）上之影響，從而影響國家行爲或形塑政治結果。就此，針對國際制度本體之分析將成爲治理研究的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也就是說，制度的良莠與實踐的成效評估都將作爲衡量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標，例如Kenneth Abbott、Miles Kahler等屬持類似途徑研究之學者。

儘管上述的制度論的學理基礎確實能令吾人在從事（安全）治理研究時，對治理的核心—「制度」—的起源、功能以及特徵有系統性的瞭解；不過正因爲此途徑的特性，在理論基礎上延續新現實主義的分析模式，亦即被Alexander Wendt與Raymond Duvall（1989, 51, 99）所批判之「依選擇而定之理論理解方式」（choice-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或「能動者中心」（agent-centric）途徑，[31] 從而使得多數研究在分析時將會過

[30] 在全球層次的國際制度，以聯合國最具有法理上的代表性。然而，一個國家對於國際制度該有何種程度的授權，都將對國家主權及自主權是否被侵蝕而言，有深遠的影響。請參閱Coglianese 2000（297-318）。

[31] 就此，能動者中心之意涵其實意味有些持此一研究途徑的學者會秉持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途徑來從事行為研究。鑑於此，要研究國家的行為，或國際制度為何會存在，在分析上實將透過行為者欲極大化其期望值的的企圖來作為研究的初步假設，請參見Jervis 1998（975）。

度重視利益、權力與能動者層面之探討，因而忽略了一些根本性的結構問題。要之，在分析區域安全時，一套理解如何維持區域安全穩定的方式，除了需考量區域性的國際制度在安全治理時扮演何種角色之外，另一個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不但涉及到該組織的起源、功能及特徵，更涉及了該組織的維持與演進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非物質力量」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扮演常數（constant）的角色，[32] 從而形成了在從事安全治理研究時一個重要的變數。此類變數並非用以否認新現實主義者所強調的能動者中心途徑之價值；對本文而言，該途徑自分析上所代表的是針對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制度主義所無法解釋窮盡之處，進行相關補充說明，從而使得吾人在從事治理研究時將能獲得更為全貌的理解。就此，一種以Wendt所主張之強調實踐與結構分析的制度中心（institution-centric）途徑，[33] 亦將使得安全治理之研究得以結合不同的理論來營造一個讓多元理論能彼此對話的空間。

Wendt的學理主張對於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主流理論而言，不啻是一項重大的挑戰。此一源自於批判學派（critical school）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與主流國關理論有著截然不同的

[32] 在研究設計上，無論是新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制度主義，持此研究途徑的學者幾乎都將行為者之認同或利益視為是既定的（given）常數，參見Ruggie 1998a（862）；事實上，這與建構主義者 意見相左，建構主義者認為國家的認同與利益其實有更多的調整與發展空間，並且亦會隨著規範性的結構變革而有所改變，可參見Hobson 2000（146）。

[33] Wendt在此所提出的制度中心途徑，正結合了國際制度研究方法中的能動者與社會結構等兩個面向，而此種分析途徑的特色不但能解釋制度的形成與起源，亦能解釋制度的發展及演化。相關內容，請參見Wendt and Duvall 1989（51-73, 66-68）。

研究取向。[34] 在本體上，建構主義是一套詮釋性的國際關係理論，強調理念有其實質影響力（Walt 1998, 40）並認爲社會實體或國際體系皆爲社會建構物（social construct），並且是互爲主體（inter-subjectivity）之相互建構。建構主義學者亦相信國家行爲係由精英的信念、集體規範以及社會認同所建構而成，其主張則傾向較爲抽象且較屬於本體論上的探究。在建構主義的分析單元中，其所關注之焦點爲個體層次，同時亦強調精英的角色，從而使得建構主義的研究途徑係採「遞升研究途徑」（inside-out approach），[35] 並強調國家行爲以及國際社會皆是透過國內文化、社會、價值、理念等國內結構所建構而成。[36] 換言之，就治理的本質而言，無論是國內層次或是國際層次的管理，皆必須植基於共通的信念與文化價值，其中尤需具備相同的認同（identity）（陳怡仲，張晉閣，許孝慈譯 2004, 495）。也就是說，如何形成共同認同之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旋即變得重要。是故，對於安全治理而言，如何詮釋價值、認同與信念等軟體（software）在安全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對區域安全之影響將不容忽視。而此一關切所實際反應的研究焦點，則正是區域意識（regional consciousness）的形成與演化。[37]

---

[34] 相關論述可參見Checkel 1998; Hopf 1998。

[35] 亦即由內而外，由國內層次推進到國際層次之分析與推論途徑。

[36] 以國際體系中之結構為例，新現實主義者認為結構是由物質力量之分配（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capability）所構成，而建構主義者則認為國際結構係由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s）所建構而成，其中包括了知識（knowledge）、物質資源（material resources）、以及習俗（practices），相關論述請參見Wendt 1995（71-81）；另可參見Ruggie 1998b。國內學者對於建構主義與安全之相關研究並不多見，可參考莫大華 2003。

[37] 類似觀點，可參見Milner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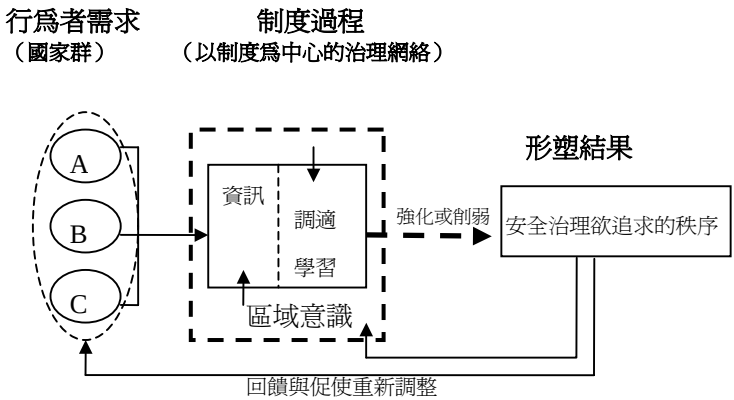
（三）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建立

鑑於上述欲建立之多元理論的對話觀點，本文所欲強調的安全議題上之治理蘊含了下列幾個關鍵命題（相關演進流程，請參見圖三）：

1. **安全治理是一種動態演化的體系或機制，也就是說，它同時是結構也是過程。其追求之目的在於透過行爲者間的協調來進一步建立秩序；**
2. **安全治理所形成的治理體系與機制係以『制度』作爲秩序提供的網絡中心，而該網絡聯結了諸多行爲者，其中包括了國家、非政府組織、國際建制及其他單元；**
3. **在實踐上，此網絡的共治行爲者將透過制度在『資訊』（information）與『調適』（accommodation）兩個面向上所發揮的功能，進而得以處理與安全相關的集體問題；**
4. **安全治理在區域安全中的實踐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各個區域中將因爲區域意識或認同之差異，而形塑出不同類型的安全治理模式。**

上述的第三與第四個命題，是本文所揭櫫之安全治理的核心概念，亦是安全治理之所以與其他用來分析東南亞安全學者的理論主張有所不同之處。其中，針對第三個命題，就安全治理的理論基礎而言，制度不但能除了促使資訊透明化，亦能藉由透過提供資訊來降低國家間互動所需考量之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除此之外，更能在合作的制度基礎上增加有效規範，使國家間的承諾更可靠（Mitchell 1998, 109, 125）。而此一提供資訊功能的實踐，正是制度在「調適」上之發展所能提供解釋。

圖三：安全治理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並修改自 Haas 1990, 19。

所謂的調適，指的是國際組織或國際建制的逐漸演化或變遷。在學理上，Haas（1990, 3）提出了頗具創見的分類與相關說明，他將組織的變遷與演化分爲「適應」（adaptation）與「學習」（learning）兩種。「調適」意指行爲者之行爲有所改變，但既存之價值不作更動；也就是說，在不去改變目的的前提下，行爲者將對追求目的的方式從事漸進式的調整。相較之下，「學習」則涉及了行爲者因爲質疑既有價值所從事的行爲改變；此種改變將使得行爲者將會質疑其所追求的目的與方法，從而致使二者被重新定義，並據此建構出新的層疊問題（nested problems）。此舉亦將使行爲者不得不在思維或知識方面進行認知演化（cognitive evolution），或者透過創新（innovation）的方式來解決新的問題。除此之外，Haas（1990, 97-154）更進

一步依此上述區別，分別架構出有關組織變遷的三種模式：（1）**漸進成長的調整**（adaptation through incremental growth）：強調一種在組織任務、方案與預算上的漸進穩定成長；（2）**複雜無成長的調整**（adaptation through turbulent non-growth）：強調組織將處於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中，從而使得決策變得更為困難；以及（3）**互賴管理的學習**（learning to manage interdependence）：強調組織不滿於漸進成長式的調整，從而嘗試透過學習的方式來處理新的問題，進而建立的一套「管理互賴」的演進模式。就此，若循著「由上而下」（top-down）的分析途徑，我們可以發現在中觀至微觀的分析層次（meso-to-micro level，即制度-行為者）中，制度作為一個不斷演化的有機體，將在其演化過程中持續提供行為者調適或學習的依循或原則；若循著「由下而上」（bottom-up）的分析途徑，則進一步可以理解此一制度的演化係來自於行為者層次的調適或學習，也就是說，行為者在制度所提供的調整或學習過程中透過創新以及認知演變等方式來投入活化（stirring）制度的動力，從而影響制度層次所提供之學習或調整方向中相關原則的設定，其中，包括了共同價值與信念的形塑與建立（復見圖三）。[38]

特別是共同價值與信念的形塑與建立將反映在本文所建立之安全治理的第四個命題中。因為安全治理的分析將融入不

[38] 特別是對行為者而言，制度透過建立起合作焦點進一步促使互惠（reciprocity）運作，來使得國家接受互惠原則。在制度的調適功能框架內，就算不在某種特定義務要求下，國家也會在信譽（reputation）之考量下犧牲短期的利益，並期待其他行為者將來也會有互惠行為的產生（Krasner 1983, 3）。

同區域所特有的結構因素，從而使得各個區域內所具有之各殊性得以彰顯，並得以解釋在不同區域中所建構之安全治理模式的發展型態與特色。也就是說，要建立一套安全治理的分析架構，除了將分析焦點置於在安全議題中之具有持續演化特質的的治理安排（governance arrangement）外，亦需進一步結合行爲者的共同價值與信念來進行解釋，方能更完整地反映出各個區域所具有之安全治理的風貌。[39]

從上述說明中，不難發現諸如「何爲治理？」以及「治理與安全的關係」等命題所象徵之意含，主要在於嘗試建立一套安全治理的邏輯，此一邏輯在區域層級上的應用則意味著：**在硬體上，強調治理機制的建立（區域性國際制度）；以及在軟體上，融入地區性的結構因素（如區域意識、共同價值與認同）。**鑑於此，我們得以初步瞭解，從安全治理來探討區域安全的維繫與演化，或將有異於傳統的解釋力。在此，透過上述對西方理論構築邏輯的回顧，我們可以獲得一些更爲深層的反省。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中，西方理論的適用問題到底是一套指導綱領，還是一系列可以類比、直接套用的邏輯思維，抑或需加入不同地區的特色與歧異來加以融合？這些都是在理論構築之外，研究者需在實際政治的運作與發展中找尋相互修正的問題解答。鑑於此，本文擬繼續就此區域安全治理模式，針對東南亞安全的發展進行回顧，並嘗試找出此一模型的經驗意涵（empirical implications）。

---

[39] 雖然一再有學者將治理（無論是全球治理或者是區域治理）當成是理想主義的新版本；不過，客觀來說，透過制度設計（institutional design）或許可以在理想與實際間找尋妥協，並進一步將理想與現實二者相互結合，可參考 Keohane 2002（260-65）。

參、重探東協安全治理模式的建構與演化

一、區域層次：「安全治理」在東南亞的建構與演化

回顧歷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南亞一帶實爲不甚平靜的地區（Southeast Asia was a turbulent place）；尤在戰後初期，區域內各國少有建設性之互動，更遑論共同營造穩定的區域安全環境。儘管東南亞國家在歷史發展與國際體系結構等因素的影響下具備了一些共同特色，[40] 不過，諸國間所具備之不同歷史、文化、語言、宗教、社會、政治及天然資源等背景則更爲明顯。

此種「分歧本質、多元凝聚」的特性，或許誠如前新加坡總理 Goh（2002）所言：「東南亞區域無論在政治、宗教、經濟發展程度上都展現出相當大的歧異，而此種歧異正是區域整合與區域合作的重要理由，雖然它亦會造成國家間在互動上的些許障礙，不過正因爲東南亞國家對這些存在已久的歧異有清楚之認知，從而使得加強區域整合的縱深與合作成爲當務之急」。泰國現任總理 Thaksin Shinawatra（2002）亦指出：「東南亞在地理上或是文化上可能具有分歧的特性，但此種分歧卻是東南亞團結力量的重要資源。」從政治菁英的言論中，吾人得以初步理解，東南亞區域一體化的共同意識早已落實在區域內的各個國家裡。整體而言，東南亞地區的發展比起其他區域來得更爲動態，基本上可以從兩個面向進行瞭解：其一爲過去幾

[40] 有關共同特色部份，各家說法不同。整體而論，可參閱顧長永 1995（1-8）；顧長永教授在文中有頗為詳細的比較與說明。

十年來的穩定經濟成長，其二則是國家在形塑和平的國際環境上的共同努力。而此種動態發展正是 David Wurfel 所提出的「東南亞動態主義」（Southeast Asian Dynamism）的表徵（Wurfel 1996, 290）。就是此種「正面的多元主義與歧異」（healthy pluralism and diversity）（Evans 1996, 3），反而為東南亞區域發展帶來更為充沛的活力，並且在更為多元的面向與議題上，建立起共同的焦點，亦注入更多可能合作的機會。長期從事東南亞安全研究的學者 Amitav Acharya 更以「東南亞協調」（Concert of Asia）這種類比「歐洲協調」（European Concert）的名詞來指稱東南亞區域安全發展的特質（Acharya 1999b, 98）。值得注意的是，從結構性的歧異到較為務實的焦點匯集之換置過程中，將統一與歧異結合在一起的關鍵因素，正是嘗試建立國際制度的努力（林若雩譯 1996, 221）。

就此，本文擬回溯到 1940 年代末期，試以安全治理的邏輯來檢視東南亞區域安全安排之歷史演進：

第一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至 1950 年代前半期（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沉潛期）：二戰結束後的東南亞地區，在美蘇兩大集團勢力的介入下，因為政治關係的二分化所造成的複雜性與壁壘分明，不但造成了越南的分裂，亦使得區域主義中之共同信念難以產生（Mackerras 1995, 550-51）。就在這個時期，首次出現了第一個與東南亞地名有關的安全組織，該組織是在 1954 年日內瓦協議（Geneva Agreement）後由美國主導並結合英國、法國、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澳洲與紐西蘭所簽訂之「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Southeast Collective Defence Treaty）所成立的「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有趣的是，此一組織特色正是名不符實，因爲東南亞公約組織基本上是美國爲佈局世界反共聯盟體系中所進行的安全安排（security arrangement）或安全同盟（security alliance），而非是由東南亞國家「本身」所建構之區域合作機制，此點從實際參與國中僅有菲律賓與泰國兩個東南亞國家即可瞭解。東南亞公約組織因爲缺乏內部一致性，從而在共同政策尚無法有效產出、執行與運作，並導致了在 1960 年代越戰爆發期間該組織的逐漸瓦解（Palmer 1992, 27; Mackerras 1995, 552）。一般對該組織的評價，主要認爲其成立其實僅具有象徵意義，並未對區域安全之有實質助益。

就安全治理的角度而言，治理概念的展現需結合國際制度（**硬體上**）與區域內的共同意識與認同（**軟體上**）。在此時期中，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與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效果不彰，不但展現出國際制度在實際運作上之有效性的缺乏；此外，此時期的國際制度並非由東南亞國家所發起，雖然已有東南亞國家的參與，不過在區域內的共同意識與認同上，亦無法建立一套屬於「區域國家本身」的區域文化或共有信念。上述兩個因素的交互影響，突顯了該時期無法建立有效之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困境。

第二階段，1950 年代後半期到 1960 年代中期（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的萌芽期）：有了東南亞公約組織的前車之鑑，在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東南亞國家「主動」成立了目標與會員資格均有所侷限的幾個區域國際組織。1959 年，當時的馬來亞總理 Tunku Abdul Rahman 提議建立一個以東南亞國家爲主的組織（Palmer 1992, 29）；在 1961 年，區域內即興起以「非

反共」爲訴求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來專責處理東南亞地區的相關事務，亦即由馬來亞、菲律賓以及泰國等三個國家所組成的「東南亞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不過此一區域組織亦在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在沙巴島（Sabah）的主權爭議糾紛不斷中，宣告夭折。隨後，菲律賓接續在 1963 年鼓吹「馬菲印組織」（Maphilindo）的成立，該組織主要囊括了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印尼。不過，沒經過多久時間，在馬來西亞的退出後，該組織亦面臨成立以來的危機（Mackerras ed. 1995, 555）。

上述區域性國際組織的成立，雖然在成效與範圍上均有所侷限，充其量只能算是東南亞「次區域體系」（sub-system）或「次區域同盟」（sub-regional alliance）的制度建立（Acharya 2002, 147），或者是Barry Buzan與Ole Waever（2003）所謂之「次複合體」（sub-complex）或「小型複合體」（mini-complex）的安全組合。儘管如此，這些早期的努力與實踐確實亦激起晚近具有東南亞特色之「動態主義」的發展，同時亦進一步重塑了具有區域共同特性之區域意識，以及創造出在這些共同特性之上運作的制度與過程之意願（Evans 1996, 11-12）。在 1967 年，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以及泰國五個國家共同簽訂了「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同時建立了「東南亞國家協會」。至今，東協仍在此種不斷演化的共同區域意識中發展。東協在建立初期並非是一個針對安全而建立的區域性國際組織，在政治合作上亦非其重點（Solidum 2003, 119），因爲在草創之時各國僅期待能在較不敏感的領域（或所稱低階政治，low politics）上進行合作，對於是否要在政治與安全層面進行有更密切之互動，則持保留的態度。儘管如此，東協的成

立確實使得東南亞國家在結構歧異外，有了得以聚合的平台，在實際操作上亦得以形塑一種正在進行的（ongoing）文化與經濟互動模式（Wurfel 1996, 276）。就此，各國在對於區域一體化之關懷上所具有之視野與期望，更因而有了匯集點，形成了一種「追求經濟成長所提供的區域穩定、和平及繁榮」的共同意識或區域認同。自 1960 年代中期以後，靠著「東協所提供的區域穩定」，[41] 東南亞區域安全的發展才開始邁入一個新的紀元（陳鴻瑜 1997, 4, 10-11）。

相較之下，此一時期的東南亞國家在區域事務上的自主性已較前一時期有所突破，無論是東南亞協會還是馬菲印組織，二者的成員全屬東南亞主要國家，同時兩個組織所涵蓋之地理區域範疇亦逐漸擴大。就本文的區域安全治理模式而言，雖然該時期的國際制度已具備「東南亞化」的特性，但其所涵蓋之範圍仍然不夠廣泛，而在區域內共同意識與認同上，國家間仍無法順利地結合國際制度的功能，亦無法透過彈性的社會化過程來結合歧異與統一，以追求安全治理的實踐。特別在此一時期中，國家間彼此不信任的例子亦層出不窮，其中又如印尼與馬來西亞的緊張關係、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在礦產極豐的沙巴群島上的爭議以及馬來西亞退出馬印菲組織等個案，在在彰顯了區域內共同意識與認同的脆弱程度。整體而言，該時期中區域安全治理模式雖然已開始萌芽，不過仍有諸多結構性的問題尚未克服。

[41] “…It Is ASEAN Foster the Regional Stability in Southeast Asia….,”（Severino 2002, 9）。

第三階段，1967 年迄今（區域安全治理的發展期）：在印尼、馬來西亞與與新加坡間經過爲期三年的衝突（*Konfrontasi*）時期後，1967 年是東南亞區域主義正式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在該年，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以及泰國五個國家在簽訂曼谷宣言後所建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除了具有地理上的代表性（geographic expression）外，亦作爲東南亞區域內各國政府間組織之互動平台。儘管在成立初期，東協國家間仍存有不信任與矛盾，但東協所提供的定期會議亦爲成員國間的協商過程與學習的社會化過程（Antolik 1990, 4; Severino 2002, 8），對於東南亞區域的合作、衝突的調停、甚至是進一步的整合，都提供一個良好的合作基礎。東協的建立不但提供緩衝會員國間衝突的功能，亦使得區域內的小國家能在區域事務上發揮作用力（Narine 1997, 965）；而東協即成爲日後東南亞地區無論是區域主義的逐漸發酵（經濟整合）或是國際合作上的持續拓展（軍事、安全方面）的重要基石（三個時期的比較，請參見表二）。[42]

[42] 誠如Findlay（1996, 187-88）所言，東協的建立意味著東南亞區域主義的逐漸成熟，從而亦使得東南亞國家的內部衝突能夠逐漸稀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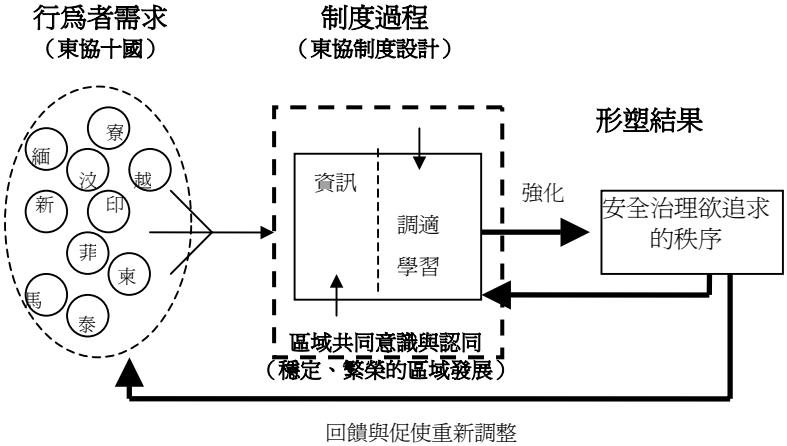
表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東南亞區域安全演進及相關評估：安全治理的觀點

發展時期發展		區域安全治理沉潛期	區域安全治理萌芽期	區域安全治理發展期
時間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至1950年代前半期	1950年代後半期到1960年代中期	1967年迄今
安全治理模式條件評估	國際制度	東南亞公約組織	東南亞協會馬印菲組織	東南亞國家協會
	區域共同意識與認同程度	低（國家間互動多見不信任與衝突）	低 — 中（有初步的制度基礎，仍見矛盾與衝突）	中 → 高（透過定期對話與互動逐步建立信任與共識）
綜合評估（有無安全治理模式）		×	×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我們進一步從曼谷宣言的內容中，可以清楚瞭解東協的建立不但是過去東南亞國家間在合作經驗上所累積的初步成果；更意味著一種在區域層次上的「創新」，象徵著政治領導人所建立之用以解決區域層次的重大問題與新議題的新原則（Solidum 2003, 79）。而東協本身亦經歷過三十多年的演變，在其組織架構與決策模式上不斷進行調整（黃奎博 2000, 195）。以本文所建立之安全治理邏輯來分析，東協的建立對於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發展而言確實關鍵，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東協確立了「東南亞安全治理模式」的雛形。在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檢視「東協安全治理模式」的內涵（請參見圖四）：

圖四：東協安全治理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並修改自 Haas 1990, 19。

在制度設計方面：東協國家對於安全治理的追求，係期待建立一套能帶來區域繁榮與穩定的秩序；而以東協爲中心之治理網絡，透過漸進演化的發展一方面將能有助於國家間的正面互動，另一方面亦能間接有助該秩序之建立。誠如 Michael Antolik 所言，在制度設計下的雙邊層級或多邊層級之諮詢過程，對於國家間的彼此調適有所助益；此外，東協此一區域組織的落實不但能制度化成員國間彼此互動的政治過程，亦能強化諸國所欲追求之穩定與繁榮的共同結果（1990, 115）；

在區域共同意識與認同方面：東協所建立的原則與規範，結合制度所提供之區域層級的社會化過程，將更有助於區域共同意識與認同的匯集。誠如Anthony Milner所言，透過東協內

部的 21 個部長級委員會、29 個資深官員小組以及 120 個技術或工作小組所建立的對話與溝通網絡，實有益於共同體意識的促進（2000, 7），[43] 特別是諸如此類的會議常將區域層次的經濟、貿易、社會等問題透過討論來形塑成一套休戚與共的共同關注，進而建立起一套屬於東協國家或東南亞國家的共同體認。而正是這種團結與共同體意識的象徵，確保了東協建立在調適上的政治過程的進一步延續（Antolik 1990, 160）。不過，在此必須要特別強調的是，此一東協安全治理在實際上的發展仍是漸進式的，主要原因在於東協成立近三十年後，此一安全治理的觸角才隨著東協版圖的擴大，漸進地朝著中南半島延伸。[44]

事實上，此一東協的發展過程亦屬關鍵，誠如Haas（1990, 158）的分析，東協在創始十年內其實係透過「互賴管理的學習」模式來進行演化。而此一演化反映在制度層面上，則是與東協本身對安全有其特有的界定息息相關----植基於一種與綜合性安全邏輯相同的「延伸性安全概念」（extended security concept）（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 2000, 218），同時涵蓋了不同層次的政治、經濟、軍事及社會等面向之互動關係。[45] 成員國

[43] Acharya（1997, 329）指出東協透過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的方式，來進行國家間的意見交換與衝突抑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東協每年有超過 200 次的大小會議，這些會議成為了成員國間最好的互動與交換資訊之場域。

[44] 在此要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建議，提醒本文在此更嚴謹地將東協/東南亞安全治理的發展進行區隔。

[45] 馬來西亞前總理Hussein Onn亦曾指出，東協國家若能在經濟合作上有其正面成果，將有助於國家安全與區域安全的維繫；就此，誠如印尼前總統Suharto在 1976 年的第一屆東協高峰會中所言，此種安全觀係基於一套內視型的（inward-looking）邏輯，主要期待建立區域內的秩序、和平與穩定，請參見Solidum 2003（196）。

即期望東協能在區域安全上發揮治理功能，例如：嘗試透過政治與經濟的聯結來緩和會員國間的潛在衝突；藉由東協的建立將有助於成員國的經濟發展，進而減緩國內因共產主義所形成的動盪；藉著促進內部安全，東協國家將藉著東協免除區域外強權勢力之影響（Lim 1998, 115; Narine 1998a, 196; 1998b, 33）。就此，對於在結構因素下長期缺少共同區域信念的東南亞安全而言，東協的建立爲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發展開啓了一個新的紀元。接續，本文擬針對東協安全治理模式在近期的發展藍圖----東協安全體----之建構與意涵作進一步的分析。

二、漸進擴大的次區域層次：「東協安全體」作爲東協安全治理模式的未來藍圖？

東協在落實安全治理與追求區域秩序上，與其演進發展有關。論者大多從歷史的角度切入，譬如國內學者陳鴻瑜（1997, 221-223）將相關發展區分爲四個時期：1、**低潮時期（1967-1970）**：此一低潮期主要肇因於沙巴領土爭議[46] 與印尼對於國內經濟的顧慮；2、**中立化概念的提出（1971-1974）**：此亦爲東協擴大的草擬時期；3、**加強鞏固期（1975-1993）**：印支國家赤化所造成對東協的衝擊及相關因應時期；[47] 以及

[46] 有關沙巴島的領土爭議與東協角色的討論，請參見Caballero-Anthony 1998（53-55）。

[47] 事實上，在此階段中即出現了越南入侵柬普寨的事件，亦挑戰了東協在穩定區域安全中所應扮演的角色，相關文獻亦可參閱Brown and Timberman eds. 1998; Lizée 2000。除此之外，Haas（1990, 158）認為在此一時期（即東協成立二十年左右）中，東協的發展陷入了「複雜無成長的調整」之型態。

4、**推動自由貿易區計畫（1994 -）**：經濟整合的實踐期。[48] 在這四個時期中，「東協安全治理模式」的體現，均是透過制度（即東協本身）與區域內的共同意識與認同（即追求經濟成長所提供的區域穩定、和平及繁榮的共同期待）的結合，進一步解決區域內的共同問題，並追求經濟整合與其他面向的合作。

不過，1990 年代之後的東南亞金融風暴、[49] 東帝汶事件的挑戰及國際政經環境的轉型等重大事件與變遷的出現，使得東協在因應諸如此類的迅速變化的前提下開始對未來發展藍圖重新省思。而本文認爲「巴里第二宣言」宣示，或將可以視爲是第五個時期----**東協共同體奠基期（2003 年迄今）**----的開始。2003 年 10 月 7 日在第九屆東協高峰會議（ASEAN Summit）中，與會領袖發表了「巴里第二宣言」，嘗試描繪東協未來的發展方向。整體而言，東協在這幾個時期所累積的成就，即代表著穩定區域安全與區域發展的制度演進象徵，而在第五個時期透過「巴里第二宣言」所建立之區域共同體的概念，更將有其學理與實際政治上之意涵。

就某種程度上而言，「巴里第二宣言」相當清楚地揭示了東協國家促進區域整合的決心及該組織未來發展的方向：即在該宣言的架構下，東南亞國家將要建構一個具有「動態性、一

[48] 有關上述各時期中的東協發展狀況，本文不在此贅述，請參閱陳鴻瑜 1997。

[49] 例如Narine（2002, 179）曾指出東南亞金融風暴對東協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1）侵蝕了東協作為亞太地區制度與政治發展的重要角色；（2）突顯了其作為經濟組織的脆弱性；（3）對東協模式的挑戰。不過，正因為金融危機的出現，間接使得東協在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上的規劃更顯迫切，其政策上的調整亦朝著更加務實的方向邁進。

致性、彈性以及整合性」的東協共同體，而此一共同體將立基在三個重要的支柱上--東協安全體、東協經濟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以及東協社會文化體（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ASCC）。特別是東協安全體的建構，在本質上與傳統的軍事同盟（military alliance）、防禦共同體（defense community）或者是帶有集體安全色彩的共同外交政策有所不同，它重申東南亞特有的綜合安全觀，期待建立一個具有東南亞特色的安全體（ASEAN Secretariat 2003）。

在探討東協安全體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整個東協共同體的發展基礎，從而透過此種特殊的脈絡（context）來分析東協安全體的建立。於此，我們可以根據「巴里第二宣言」的內容，透過下列幾個層次來分析整個共同體的發展基礎及其建構過程的分析來剖析：[50]

1. 就東協共同體本身而言（理想層面）:「巴里第二宣言」揭櫫了對東南亞未來之區域發展而言一個極為重要的方向----以東協共同體作為東南亞未來區域合作的共同願景。在「巴里第二宣言」中，東協國家一再強調共同體應當建立在政治與安全合作、經濟合作以及社會文化合作等三個重要的支柱上，並且亦需立基於「動態性、一致性、彈性以及整合性」的共同價值上。這種發展方向是清晰的，並且亦再一次強調了東南亞區域發展的特殊性。進一步解讀，我們不難發現，它所強調的**「動態性」**正反映了**東南亞區域的「動態主義」**;**「一致性」**則是反

[50] 以下內容，整理自「巴里第二宣言」，並進一步加以說明。有關「巴里第二宣言」的詳細內容，可參見ASEAN Secretariat 2003。

映了**東南亞國家的集體區域利益**；而**「彈性」**所反映的就是**國家利益的自主特質**；最後，**「整合性」**則是反映了**東協本身近幾十年來的合作成果**不容被忽視。結合三種特質，東協共同體正象徵著一個東南亞國家在區域層次所共同期待之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51]

2. 對於共同價值的形塑而言（共同意識與認同層面）：雖然東南亞國家在文化、社會、經濟成就、發展程度以及宗教等方面有諸多歧異，不過「巴里第二宣言」卻強調東協國家仍享有諸多共同的價值，譬如：討論政治議題的諮詢習慣以及在共同關注之事務（環境合作、海事安全合作、防禦合作、建立社會政治價值與原則、透過和平方式解決爲其長久的爭端）上有「共享資訊」的意願。事實上，這些共同價值與意願，透過東協所提供的制度性基礎，將**「轉譯」**（translate into）成更爲務實的合作焦點，有助於國家間在不同議題範疇內的合作；

3. 區域發展的核心（規範層面）：對於東南亞區域發展而言，區域合作與未來繁榮與和平之共同體前景誠屬重要，不過國家在區域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以及其所應具備的權利與義務則是更爲關鍵。鑑於此，1976 年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爲區域內國家互動關係奠下了一個重要的行爲準則，針對國家間的關係，該條約強調：（1）彼此尊重各國之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以及國家認同；（2）每個國家爲求生存，皆有避免外來干涉、顛覆或

[51] 在此，本文借用Benedict Anderson在論述民族主義（nationalism）時所使用的想像共同體之概念，來強調此一共同體願景是東協國家現階段的共同想像。有關想像共同體的想像形塑過程，可參見Anderson 1998。

壓迫的權利；（3）不干涉他國內政；（4）和平解決歧異與爭端；（5）拒絕武力的威脅或使用武力（陳鴻瑜 1997, 235）。這一套作爲促進區域內和平與穩定之重要外交機制的行爲準則，不但在早期形塑了東南亞國家的共同價值，至今亦進一步提升了東協的角色；

4. 對於東協的角色定位而言（詮釋與落實想像的制度層面）：對現今的東南亞國家而言，東協共同體或許只是一種對於未來區域發展的願景，而邁向此願景之途必將費時頗長。針對此，「巴里第二宣言」強調在此一冗長的發展過程中，爲了因應區域內部各國情勢的動態發展，東協實應秉持有效的轉譯功能，將文化歧異與不同的經濟層級轉換成更爲穩定的區域彈性與和諧的環境下所具備之公平發展機會與繁榮前景，從而使得想像的共同體不會僅止於想像階段。事實上，在甫成立之階段，東協並不認爲該制度本身爲一個安全團體（security grouping），從而一再將建立之目標鎖定在經濟與功能性合作上，[52] 不過，難以否認的是，區域秩序的穩定與安全狀態的維持一直是隱藏在東南亞區域發展中一條極爲敏感的神經，從而使得具有東南亞色彩的綜合安全觀，逐漸在東協發展與演化過程中進一步發酵，並影響東南亞國家在區域合作與穩定區域秩序上的合作態度與模式。

從上述幾個層次中，我們得以初步觀察到朝著東協共同體方向前進的東南亞區域發展，基本上具有一種「多階段投射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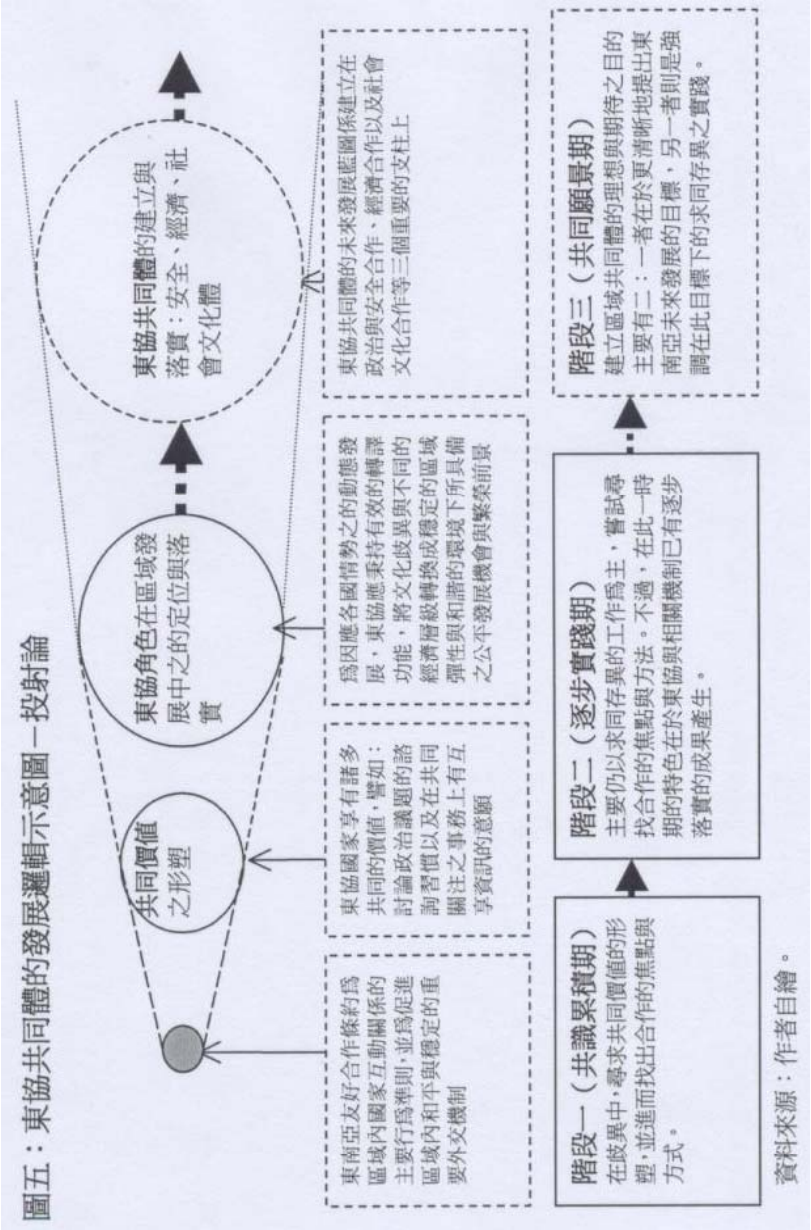
[52] 在 1976 年的第一次東協高峰會議中，其主軸係與經濟方面的合作相關，在宣言中甚至沒有提到「安全」的字眼，可參見ASEAN Secretariat 1976。

的發展模式。此種多階段投射之發展模式，首先由「核心」投射到「共同價值」，嘗試在歧異中，尋求共同價值的形塑，並進而找出合作的焦點與方式；接續，再由「共同價值」投射到「東協的實際發展」上，透過東協與相關機制來推動朝著共同體方向邁進的區域發展。最後再由「東協的實際發展與演化」投射到未來的「東協共同體之願景」上（可參見圖五）。

沿著東協安全體的基礎及其建構過程之發展脈絡，在此，我們得以進一步透過安全治理的邏輯來探討「東協安全體」的建構與發展。如果我們以狹義的軍事安全或國家安全來定義所謂的安全概念，我們可以清楚發現，早期的東協其實並不將合作之焦點放在安全的關注上。主要原因在於談到「安全」勢必將涉及較為敏感的權力問題與國家主權問題，從而可能違背 1976 年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精神，進一步侵蝕原有的合作基礎與國家間的信任。一直到了 1992 年東協國家的領袖才明確地同意安全合作是一項重要且值得推動的目標，從而開始直接觸及安全議題。[53] 不過，如果我們以較為寬鬆的安全觀來檢視東協在安全合作上的實踐與相關發展，不難發現從 1967 年的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 of 1967），1971 年吉隆坡宣言（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f 1971），或者是 1971 年的「和平自由中立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ZOPFAN）等廣義的制度面的落實，即為當時因應到區域安全發展所倡議的新機制。在實際政治上，特別是柬普寨問題，東協成功地發揮功能來作為一個有效的機制，動員實質之全球有效力量來抑

[53] 事實上，在 1976 年的 東協宣言中即直接排除安全作為東協合作架構下的主題。可參閱Duffield 2003（247），以及該文註 16。

圖五：東協共同體的發展邏輯示意圖－投射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制 1979 年到 1989 年間越南對柬普寨的入侵，亦爲一重要的里程碑（Weatherbee 1993, 44）。除此之外，將「東協模式」應用到區域安全上的新區域安全論壇，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亦可作爲新安全關注的發展脈絡。上述這些在安全合作上的落實，[54] 都是東南亞區域安全在未來發展中得以順利維繫的重要關鍵，而**東協安全體的建構不但是東協區域安全治理模式演化後的產物，更將是上述安全安排加以整合的重要匯集**。也就是說，「東協安全體」嘗試透過「網絡化」的聯繫，建立一個綿密而完備的理想安全體系。鑑於此，就安全治理模式的邏輯而言，「巴里第二宣言」針對東南亞區域安全的宣示有下列幾點意涵：[55]

1. 東協安全體建立的意涵：此一意涵主要可以從安全體本身以及作爲安全體之基礎的東協國家等兩個層次來進行檢視：

（1）對安全體本身而言：對「巴里第二宣言」而言，東協安全共同體之建立，旨在將東協內部的政治與安全合作提升到更高的層級，來確保區域內的國家皆能對內或對外和平相處。也就是說，不過此一安全體並非是以封閉性的軍事同盟來進行建構，而是透過一系列能結合區域內與區域外在安全議題上有所互動的網絡聯結機制，來維繫東南亞區域甚至是亞太地區安全的穩定；

[54] 誠如Amitav Acharya所言，無論在新安全觀與安全合作形式的接受上，或者是將這些概念轉化成實際制度的實踐，都已逐漸獲得認可，可參見Acharya 1995（182）。

[55] 以下內容，整理自「巴里第二宣言」並由作者加以分析之，宣言完整內容請參見ASEAN Secretariat 2003。

（**2**）**對東協國家而言：**透過東協安全體的建立，國家更應特別強調區域內針對爭端的和平解決過程，並且視己身之安全基於地理位置、共同願景以及共同目標從而緊扣著其他國家的安全；換言之，「巴里第二宣言」的精神即在彰顯出一個重要的概念：**無論在政策面還是策略面，以一個休戚與共的安全認知來結合鄰近國家的安全利益，將會是東協國家的重要關切**；

2. 東協安全體的定位：「巴里第二宣言」清楚揭示了東協安全體的建立，在本質上並非爲一個封閉性的防禦公約、軍事同盟或共同外交政策，而是依據「東協願景 2020」（ASEAN Vision 2020）所建立起之結合政治、經濟、社會現實的考量，所建構之一套廣義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面向的綜合安全原則。此一安全原則在議題範疇上超越了傳統軍事安全的範疇，並藉此原則進一步結合東協經濟體、東協社會文化體，來作爲未來落實東協共同體之重要支柱；

3. 安全體內部的核心價值：在此，我們透過東協國家、東協與安全體本身等三個層次來檢視「巴里第二宣言」中所宣示的核心價值：

（**1**）**對於東協國家而言：**依據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所揭示的相關精神（如不干涉內政原則等）依舊是東協國家所具有之免於被外力干預內政事務的權利，以及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原則。換言之，此一共同價值的重要性依舊關鍵；[56]

[56] 當然，論者針對這些原則在實踐上的效度及其可能面臨之挑戰，亦有不同的觀點或批評，請參見黃奎博 2000（196-197）。

（2）對於東協而言：作爲東南亞區域性國際組織，特別是在區域安全的維持與鞏固上，東協仍是促進區域穩定與和平的重要機制。而東協內部的安全治理機制之演化，更將依據東南亞國家協會宣言以及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等重要原則，來進行制度面的發展，並進一步提供國家在資訊與調適面上的形塑效果；

（3）對於安全體本身而言：東協安全體係基於東協的不干涉內政原則、以共識爲基礎的決策模式、國家與區域彈性、對國家主權的尊重、放棄威脅或武力的使用、和平解決歧異或爭端的方式。[57] 換言之，這些核心價值在未來的安全體發展過程中，仍將持續扮演極爲重要的角色；

4. 傳統安全治理模式的延續：「巴里第二宣言」指出東協安全體的建構，並非捨棄東協既有的傳統安全治理機制，其中包括了和平中立區、友好條約、東南亞非核區等重要政治措施。事實上，在安全體的發展過程中，這些安全治理機制仍應該發揮其在資訊提供與調適過程中的相關功能，因而更需強化其信心建立機制、預防外交以及衝突解決途徑的角色。特別是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所揭示的高層委員會（The High Council），應扮演更重要的解決爭端化解爭議之角色；

5. 演化後的重新結合：網絡式的安全治理

（1）對內：東協安全體應該發揮既有制度與機制的功能，來強化東南亞國家或區域在處理區域事務上的能力，特別是

[57] 有關不干涉內政原則與區域主義之發展亦可參見Acharya 2002（222-40）。

進一步結合東協區域論壇所提供之協商（即針對資訊透明化而言）與合作（及針對國家間在相關政策上的調適而言）之機制，透過網絡式的聯結與發展來增強安全治理模式功能之發揮；

（2）對外：事實上，「巴里第二宣言」亦強調東協安全體歡迎東協的對話伙伴，透過共同努力來促進該地區之區域和平與穩定。也就是說，東協安全體亦需在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上，強化與聯合國或其他國際或區域組織間的合作關係；而此一關係的建立與聯結，亦需透過安全體中之東協區域論壇，透過對話伙伴的擴大與結合，進而在資訊透明化與降低衝突的對話功能上，追求維持區域安全的機會；

6. 最後，在安全治理的實踐方式上：就「現階段」東協內部之安全治理模式的發展而言，東協安全體其實仍在願景與理想的階段，在落實上仍以既有的安全治理機制爲主。不過，「巴里第二宣言」強調應該要以更爲「創新」的方式（其中包括了規範設定（norm-setting）、衝突預防、衝突解決途徑以及衝突後的和平建立等途徑或措施）來促使東南亞區域安全的鞏固（Acharya 2002, 102），並且嘗試建立東南亞國家對於東協安全體的共同意識。這些新的努力，將以透過網路聯結的方式來結合東協制度內、外的安全治理模式，在理想上，將能有效鞏固該區域之安全、和平與穩定。

從上述對於朝向「東協共同體」方向前進的東南亞區域發展，以及進一步對東協安全體建構之歷程與意涵的探討中，得以理解東協安全體其實正是東南亞一連串安全治理的重要彙

集與聯結。從早期的曼谷宣言所初步描繪的東協區域發展藍圖及區域共同意識的建構，逐漸過渡到 1971 年吉隆坡宣言中，針對「和平自由中立區」與「東南亞非核區」（Southeast Asia Nuclear Weapons Free Zone, SEANWFZ）的建立，強調區域安全必須將區域合作擴大到其他國家，東協內部的不結盟國家如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國，正嘗試透過此一機制的建立，將區域外的勢力驅逐出東南亞，從而再次強化並鞏固東南亞的區域意識（Buszynski 1992, 831）。隨後，東協國家的合作意願再進一步於 1976 年「友好條約」中發酵，從而建立區域合作的行爲準則以及以東協模式爲基石之區域發展基礎。在 1990 年代，透過東協區域論壇的建立，建構了東南亞國家與區域外勢力進行互動的對話機制或制度平台，透過制度在「資訊」與「調適」兩個面向上的功能發揮，聯結區域內外的勢力，進而形塑出 2003 年「巴里第二宣言」中所欲揭櫫之東協安全體的願景。這一系列的安全治理之發展，正是透過制度的演化以及區域意識及認同的逐漸成熟而得以展現。

誠如圖五所示，此種共同價值與共有的區域意識亦投射到東協時期的安全治理模式上；從內到外，東協不斷強調一種基於馬來文化的特殊協商與共識建立模式，透過「東協模式」作爲對內的治理機制或解決爭端機制的共同價值，此種基於共識且具有彈性的模式，使得東協得以更有彈性地超越制度面的侷限，進而促進區域安全的穩定與維持（Acharya 1995, 187-89; Narine 1998b, 34）。除此之外，對於區域外勢力之發展、聯繫與互動，東協模式亦透過東協區域論壇的機制，成功地結合了強權國家作爲對話伙伴，一方面穩定了亞太地區的安全，不致

使東南亞國家在亞太地區安全結構中缺席；一方面藉由積極的參與從而有效穩定東南亞地區的區域安全。整體而言，晚近所規劃的東協未來安全治理模式----東協共同體，或許真能將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時代。

肆、結語
區域安全治理之研究與其在經驗意涵上的省思

本文嘗試結合治理的觀點，針對東南亞安全進行分析，文中除了初步回顧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發展外，亦進一步針對東協的安全治理模式的最新發展進行分析。鑑於此，全文先從學理面著手，嘗試建立一套分析模型將治理概念應用在安全議題上，並依循該模型的邏輯來研究東南亞區域安全。事實上，在日趨多元且愈益動態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實難透過一套單一理論來解釋愈益複雜的國際現象或問題，從而本文將面臨在研究國際關係理論上最主要的挑戰----如何對理論解釋力的困窘進行調適。特別是將傳統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假設、命題、邏輯與推論方式進行回顧或進一步重組時，更會面臨到此種困窘以及在解釋新事實上的侷限性。

誠如 Ikenberry 與 Doyle（1997, 266-80）所言，在理論研究上的長時間變革、對話以及相互辯論將進一步激起國際關係理論中更爲多元之新興理論觀點的產生。新興之理論觀點並非全然推翻前期理論之所有論述，相反地，在研究途徑上將適度結合前期理論的重要命題，並結合時代變遷而演化出格局更廣之堅實理論依據。又如國際政治大師 Holsti（1989, 256）的提醒，在如此複雜且變遷迅速的世界裡，一套「理論上之多元論」

的存在，將會是解釋複雜國際社會之現實的唯一途徑。由此可見，在不斷演化的理論研究中，誠如 Holsti 所提出的「理論多元論」觀點之產生，亦將對激起在國際關係研究中諸多分析架構的重構契機。就此，嘗試循著該觀點來從事國際關係的相關研究，即給予了本文在理論建構與經驗分析上不少的啓示。

最後，本文在此嘗試針對此一「安全治理」在未來的理論研究、理論的經驗意涵以及東南亞安全的展望上，提出幾項省思：

一、首先，在未來相關理論的研究方面：對於本文而言，儘管在研究設計上嘗試透過整合性之理論觀點來建立一套「區域層次」的安全治理原型（proto-type）邏輯來分析東南亞區域安全，但在理論建構上確實仍未臻完善，亦有諸多有待深入之處。在此，本文期待透過前文對於「安全治理」之理論基礎與經驗案例上的初步梳理，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期望能在日後結合更爲全面、且更爲細膩的經驗研究，藉以增益此一區域安全治理之研究縱深，以裨日後愈亦複雜之區域安全研究。譬如，如何從學理觀點將區域層次的「安全治理」與區域外的結構因素之互動關係進行銜接？或者各個區域中特有的安全治理模式之對照與比較等，均有待更具系統化之論述與理論發展；

二、再者，在理論的經驗意涵方面：從東南亞區域安全演化歷史中，不難發現東南亞地區並非在每個時期中皆能順利建構起適當的安全治理模式。甚至到東協成立之後，儘管東協本身的安全治理之實踐略具規模，抑或晚近出現的東協安全體之

倡議，在理論上頗符合區域安全治理的發展；不過，在實際綜合安全事務的治理方面上，東協仍面臨諸多挑戰。特別是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對於東南亞國家以及東協的衝擊甚深，而日益多元的威脅如國內經濟蕭條、因多元分歧文化而起的宗教與種族衝突、領土糾紛以及與最爲敏感的南海主權爭議等問題，在在都有可能削弱區域內的共同意識與認同，從而在理論上影響安全治理模式中的制度角色，進而對區域安全的穩定有所威脅。除此之外，美、日、中等強權間的互動關係是否亦會對東協未來走向有所影響，[58] 或者對於東南亞區域意識與認同的建構有無衝擊，這些對於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潛在影響因素，都將會是日後從事進一步經驗研究或個案研究的幾個重要的切入點；

三、最後，在區域安全未來發展方面：雖然針對東協的發展，特別是在廣義的制度面上，「巴里第二宣言」所揭示的發展方向能夠重新詮釋東協在近期與不遠的未來中所居之關鍵定位。而「巴里第二宣言」亦強調東協將以一個更具共同意識的社群或共同體，涉入國際事務的運作。儘管如此，吾人亦不能過度高估「巴里第二宣言」的影響力，因爲諸如「東協宣言」、「吉隆坡宣言」、「東協巴里宣言」、「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東南亞核武中立區條約」、「東協 2020 願景」、「河內行動計畫」（the Hanoi Plan of Action, 1999-2004）、「東協整合倡議」（the Initiative for ASEAN Integration, IAI）以及東協整合路徑（the Roadmap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SEAN, RIA）等，都已在東協發

[58] 譬如，Wayne Bert在 2003 年的新著，可參見Bert 2003。

展歷程中或區域安全的未來發展方向上奠下了相對重要的基礎。而這些重要的里程碑，亦進一步形塑了東南亞區域的共同意識與認同，透過共同體型態的區域意識與認同之詮釋與初步建構，「在理論上」將能提供東南亞國家更爲穩定、和平的區域環境。儘管如此，針對東南亞區域安全的未來發展，吾人將更需留意下列幾個事件的影響：

1. 除了上述之區域內的潛在共同問題外，「東協模式」在解決爭端的效度與運作效率上是否能有所提升，或者是否能夠因應愈趨複雜之區域事務與爭端的動態發展，從而得以發揮安全治理的功能，確實值得關注；

2. 近期所興起之以中國爲首的「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概念及相關實踐，亦將可能對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發展，特別是在經濟方面，更有直接之影響；

3. 除此之外，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近年來對東亞地區的戰略重新佈局以及東北亞局勢的持續變遷，從「結構面」來看，亦將會與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發展有相當密切之聯繫；要之，上述幾個因素均極有可能是東南亞區域安全未來所將面臨之區域內/外的關鍵壓力；當然，亦將會是安全治理之相關研究在實踐上與學理上需持續努力之處。

（收件：2004 年 9 月 8 日，最後修正寄回：2005 年 3 月 7 日，接受：2005 年 3 月 22 日）

參考文獻

王逸舟，1999，《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沈宗瑞等譯，2001，《全球化大轉變：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台北：韋伯出版社。譯自 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肖歡容，2003，《地區主義：理論的歷史演進》，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林若雩譯，1996，《東南亞政治與發展》，台北：韋伯出版社。譯自 Nichael R. J. Vatikiotis.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6.

林碧炤，2001，〈全球治理與國際安全〉，《國際關係學報》，16：157-171。

耿協峰，2003，《新地區主義與亞太地區結構變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2000，《亞洲的安全挑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自 Wilfried A. Herrmann, ed. *Asia's Security Challenge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1998.

張亞中，2001，〈全球治理：主體與權力的解析〉，《問題與研究》，40（4）：1-24。

莫大華，200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出版社。

莫大華主編，2002，《亞太安全的理論與實踐：台灣的角色與

作爲》，台北：遠景基金會。

陳怡仲，張晉閣，許孝慈譯，2004，《全球政治經濟學：掌握國際經濟秩序》，台北：桂冠出版社。譯自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陳欣之，2000，《東南亞安全》，台北：生智文化。

陳鴻瑜，1997，《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陸忠偉編，2003，《非傳統安全論》，北京：時事出版社。

黃奎博，2000，〈冷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國際關係學報》，15：173-214。

黃偉峰，2003，〈剖析歐洲聯盟正在成形的治理體系〉，《歐美研究》，33（2）：291-344。

楊昊，2003，〈APEC 與亞太安全：變動中的建制演化結構及其挑戰〉，《亞太經濟合作評論》，11：103-116。

楊昊，2004a，〈治理與東南亞安全：東南亞安全治理模式的建構與演變〉，「2004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會，台北：淡江大學。

楊昊，2004b，〈東協安全治理模式的建構與發展：新自由制度主義研究綱領的重新省思〉，「從比較觀點看國家治理的新模式」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

劉復國，1999，〈綜合性安全與國家安全：亞太安全概念適用性之檢討〉，《問題與研究》，38（2）：21-37。

鄭端耀，1997，〈國際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之評析〉，《問題與研究》，36（12）：1-22。

謝宗學、劉坤億與陳衍宏譯，2002，《治理、政治與國家》，台

北：智勝文化。譯自 Jon Pierre and B. Guy Peters.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藍玉春，2005，〈歐盟多層次治理：論點與現象〉，《政治科學論叢》，24：49-76。

顧長永，1995，《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

Aalberts, Tanja E. 2004. "The Future of Sovereignty in Multilevel Governance Europe: A Constructivism Reading."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2 (1): 23-46.

Abad, M. C., Jr. 1999. "The Challenge of Balancing State Security with Human Security."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apcity/unpan010337.pdf> (December 25, 2003).

Abbott, Kenneth W., and Duncan Snidal. 2001. "Why States Act through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Polit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ed. Paul F. Diehl.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Acharya, Amitav. 1995. "ASEAN and Asia-Pacific Multilateralism: Managing Regional Security." In *New Challenges for ASEAN: Emerging Policy Issues*, eds. Amitav Acharya and Richard Stubbs. Vancouver: UBC Press.

Acharya, Amitav. 1997.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ASEAN Way' to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10 (3): 319-46.

Acharya, Amitav. 1999a. "Realism,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1 (1):

1-29.

Acharya, Amitav. 1999b. “A Concert of Asia?” *Survival* 41 (3): 84-101.

Acharya, Amitav. 2002.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Essays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Akaha, Tsuneo. 1991. “Japan’s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olicy: A New East Asian Environment.” *Asian Survey* 31 (4): 324-40.

Alagappa, Muthiah. 1998. “Asian Practice of Security: Key Features and Explanations.” In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 ed. Muthiah Alagapp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Benedict. 1998.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Antolik, Michael. 1990. *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Art, Robert J., and Patrick M. Cronin. 2003.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ASEAN Secretariat. 1976.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First ASEAN Head of Government Meeting.” <http://www.asean-sec.org/5053.htm> (Jan 15, 2004).

ASEAN Secretariat. 2003.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 (Bali Concord II).” <http://www.aseansec.org/15159.htm> (December 30, 2003).

Ashley, Richard K. 1989. “Imposing International Purpose: Notes

on a Problematic Governance." In *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for the 1990s*, eds. James N.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Toronto: Lexington Books.

Ball, Desmond, ed. 1996.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 Ltd.

Baylis, John. 1997.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t, Wayne. 2003.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Bhatta, Gambhir, and Joaquin L. Gonzalez III. 1998. *Governance Innov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rends, Cases and Issues*. Hants: Ashgate Publishing Ltd.

Biligin, Pinar. 2003.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Dimensions of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5: 203-22.

Breckon, Lyall. 2003.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SARS and a New Security Initiative from China."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Quarterly E-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5 (2): 73-78.

Brown, Frederick Z., and David G. Timberman, eds. 1998. *Cambod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Quest for Peace,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Buszynski, Leszek. 1992. "Southeast Asi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sian Survey* 32 (9): 830-47.

Buzan, Barry. 1991a. *People, States &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Buzan, Barry. 1991b.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 61 (3): 431-51.

Buzan, Barry, and Ole Waever. 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ballero-Anthony, Mely. 1998. “Mechanisms of Dispute Settlement: The ASEAN Experie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 (1): 38-66.

Capie, David, and Paul Evans. 2002.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han, Steve. 1992. “Humanitarianism, Mercantilism, or Comprehensive Security? Disbursement Patterns of Japan Foreign Aid.”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19 (1): 3-17.

Checkel, Jeffrey T. 1998.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50 (2): 324-48.

Coglianese, Cary. 2000.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eds. Joseph S. Nye, Jr. and John D. Donahu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Debiel, Tobias. 2000. “Strengthening the UN as an Effective World Authority.” *Global Governance* 6 (1): 25-41.

Diehl, Paul F. 2001. *The Polit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Duffield, John S. 2003. “Asia-Pacific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eds.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vans, Gareth. 1994.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Foreign Policy* 96: 3-20.

Evans, Paul M. 1996.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 of the Emerging Order in Asia Pacific.”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Dynamic Region*, eds. David Wurfel and Cruce Burton.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Ltd.

Ferguson, R. James. 2004. “ASEAN Concord II: Policy Prospects for Participant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6 (3): 393-415.

Findlay, Trevor. 1996. “Turning the Corner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Internal Conflict*, ed. Michael E. Brow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Frey, Bruno S. 1997. “The Public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Perspectives on Public Choice: A Handbook*, ed. Dennis C. Muel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llarotti, Giulio M. 1991.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ystemic Failure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 (2): 193-220.

Goh, Chok Tong. 2002. “Deepen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http://www.aseansec.org/12322.htm> (September 6, 2003).

Goldstein, Judith, et al, eds. 2001.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Grieco, Joseph M. 1993.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ed. David A. Baldw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as, Ernst B. 1990. *When Knowledge is Power: Three Model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ggard, Stephan, and Beth A. Simmons. 1987.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3): 491-571.

Held, Davi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Polity Press.

Hobson, John M. 2000.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sti, K. J. 1989.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ich Are the Fairest Theories of Al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 (3): 255-61.

Hopf, Ted. 1998.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1): 171-228.

Ikenberry, G. John, and Michael W. Doyle. 1997. “Conclu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ds.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Jachtenfuchs, Markus. 2001. "The Governance Approach to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9 (2): 245-64.

Jervis, Robert. 1998. "Real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971-91.

Jones, Walter S. 1996.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Junne, G. C. A. 200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 Period of Globalization: New (Problems of) Legitimacy." In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ds. Jean-Marc Coincaud and Veijo Heiskane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obert O.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Keohane, Robert O. 1990.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45: 731-64.

Keohane, Robert O. 2002.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Keohane, Robert O., and Lisa L. Martin. 1998.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eds. Michael E. Brown et al.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Keohane, Robert O., and Lisa L. Martin. 2003. “Institutional Theory as a Research Program.” In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eds.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Cambridge: MIT Press.

Klare, Michael T., and Daniel C. Thomas, eds. 1991. *World Security: Trends & Challenges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Knoke, David. 1990. *Political Network: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oiman, Jan. 2003. *Governing as Governa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Krahmann, Elke. 2003.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One Phenomenon or Many?” *Global Governance* 9: 323-46.

Krasner, Stephen D., e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asner, Stephen D. 2001. “Sovereignty.” *Foreign Policy* 122: 20-26.

Kratochwil, Friedrich, and John G. Ruggie. 198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4): 753-75.

Lake, David A. 2001. “Beyond Anarchy: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1): 129-60.

Leifer, Michael. 1990.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Lim, Robyn. 1998.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Building on Sand.”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 (2): 115-36.

Lipschutz, Ronnie D., ed. 1995.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izée, Pierre P. 2000. *Peace,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Cambodia: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olution*.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Ltd.

Lynn, Laurence E., Jr., Carolyn J. Heinrich, and Carolyn J. Hill. 2000. "Studying Governa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0 (2): 233-61.

Lynne-Jones, Sean M.,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1995. *Global Dangers: Changing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Mackerras, Colin, ed. 1995.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 Multidisciplinary Surve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Maidment, Richard, David Goldblatt, and Jeremy Mitchell. 1998. *Governance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Makinda, Samuel. 2000. "Recast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New Millennium, New Perspectives: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eds. Ramesh Thakur and Edward Newma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Makinda, Samuel M. 2001.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in the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3 (3): 401-19.

Martin, Lisa L., and Beth A. Simmons. 1998.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729-57.

Martin, Lisa L., and Beth A. Simmons. 2001.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

Masechusett: The MIT Press.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Milner, Anthony. 2000. “ASEAN + 3, ‘Asia’ Consciousness and Asian Values,” PROSEA Research Paper No. 39. Taipei: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Mitchell, Ronald B. 1998. “Source of Transparency: Information System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2 (1): 109-30.

Narine, Shaun. 1997. “ASEAN and the ARF: The Limits of the ‘ASEAN Way’.” *Asian Survey* 37 (10): 961-78.

Narine, Shaun. 1998a. “ASEAN and the Management of Regional Security.” *Pacific Affairs* 71 (2): 195-214.

Narine, Shaun. 1998b.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ASEAN.” *World Affairs* 161 (1): 33-47.

Narian, Shaun. 2002. “ASEAN in the Aftermath: The Consequence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Crisis.” *Global Governance* 8: 179-94.

Nye, Joseph S. Jr., and John D. Donahue. 2000.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Nye, Joseph S. Jr., and Sean M. Lynn-Jones. 198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 (4): 5-27.

Nye, Joseph S., Jr. 1991.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O’Brien, Robert, et al. 2002. *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Social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udraat, Chantal de Jonge. 2000. "Intervention: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New Millennium, New Perspectives: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eds. Ramesh Thakur and Edward Newma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Palmer, Norman, D. 1992. "SEATO, ASA, Maphilindo and ASPAC." In *The ASEAN Reader*, eds. K.S. Sandhu et 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almer, Olaf. 1982. *Common Security: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NY: Simon and Schuster.

Pierre, Jon. 2000. *Debating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hodes, R. A. W. 1997.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ct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Ballmoor: Open University Press.

Rosenau, James N. 1982. "Order and Disorder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The Essay in Search of Perspective." In *Globalism Versus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rd Debate*, eds. Ray Maghroori and Bennett Ramberg. Boulder: Westview Press.

Rosenau, James N.,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1992.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uggie, John G. 1998a.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855-85.

Ruggie, John G. 1998b.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Ruggie, John Gerard, ed. 1993.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ato, Tetsuo. 2001. "The Legitimacy of Security Council Activities under Chapter VII of the UN Charter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ds. Jean-Marc Coincaud and Veijo Heiskane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Sedelmeir, Ulrich. 2001.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cy Analysis and Governance: A European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Western Politics* 24 (3): 173-82.

Severino, Rodolfo C., Jr. 2002. *ASEAN Today and Tomorrow*.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Shinawatra, Thaksin. 2002. "Asia Cooperation Dialogue-the New Asian Realism." <http://www.aseansec.-org/13966.htm> (September 6, 2003)

Singer, J. David. 1961.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eds. J. David Singer,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mouts, Marie-Claude. 1999. "Multilateralism from Below: A Prerequisite for Global Governance." In *Future Multilateralism: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Framework*, ed.

Michael G. Schechte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Craig A., ed. 1999.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New York: Routledge.

Solidum, Estrella D. 2003. *The Politics of ASEAN: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Stares, Paul B., ed. 1998.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A Global Survey*.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ares, Paul. 2000. "'New'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In *New Millennium, New Perspectives: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eds. Ramesh Thakur and Edward Newma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Starr, Harvey. 1997. *Anarchy, Order, and Integration: How to Manage Interdependenc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Stokke, Olav Schram. 1997. "Regimes as Governance System." In *Global Governance*, ed. Oran Young.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Tehranian, Majid, ed. 1999. *Worlds Apart: 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IB Tauris Publishers.

Terriff, Terry, Stuart Croft, Lucy James, and Patrick M. Morgan. 2001. *Security Studies Toda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Caroline. 2000. *Glob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The Challenge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London: Pluto Press.

Tow, William T. 2001.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UN. 2003. "Annual DPI/NGO Conference 'Human Security and Dignity: Fulfilling the Promis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be Helf from 8 to 10 September" <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3/ngo514.doc.htm> (December 30, 2003).

Väyrynen, Raimo. 1999.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mmon, Cooperative or Collective?" In *Future Multilateralism: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Framework*, ed. Michael G. Schechte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Walt, Stephen M.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110: 29-46.

Waltz, Kenneth 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2 (4): 693-700.

Weatherbee, Donald E. 1993. "Southeast Asia's New Agenda." *Current History* 92: 413-20.

Wendt, Alexander.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 71-81.

Wendt, Alexander, and Raymond Duvall. 1989.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for the 1990s*, eds. James N.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Toronto: Lexington Books.

Wurfel, David. 1996. “The ‘New World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Some Analytical Explo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Dynamic Region*, eds. David Wurfel and Cruce Burton.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Lt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curity Governance":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ASEAN *Security Governance*

Hao Yang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ery few scholars engaged in integrating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eithe theoretically or empiric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of "***security governance***." Empirically, this paper tends to elucidate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It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proposed in the 9th ASEAN Summit of 2003 and analyze its implication to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scrutinizes the governance of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ree portions are included: (1) ***conceptualization***: the literature of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respectively,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 to regional security are proposed; (2) ***empirical illustration***: the evolu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governance is examined; (3) ***theoretical reflec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further discussed.

Key wor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overnance, security governance,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